

## 法國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兼論 人類學物件之特性及實證人類學之建立\*

戴麗娟\*\*

一般人類學史研究多以重要學派思想或知名人類學家之理論入手，較少從學科發展制度、機構、實作規範等方面探討，然而這些面向卻是學科建制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本文以二十世紀上半期法國人類學建制化為討論對象，並指出博物館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人類學尚未被法國大學系統承認為一獨立學科之前，博物館其實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工作環境，是一個讓對此新興學問有興趣的學子可以在其中求取專業知識的場所。位於巴黎的人類博物館在當時不僅是一個基本研究材料匯集和整理的地方，人類學知識生產和流通的中心，也是人才養成的場所，更是該學科與外界社會接觸的重要櫥窗。對於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從不同行業或學科轉入這個新興學科摸索學習的第一代學生而言，該博物館更是他們職業生涯認同的對象，也是他們晚年對自己職業生涯回顧時一個共同記憶的所在。

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因為巴黎大學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設立了第一個民族學中心而改變，要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奠基者的凋零、第一代學者的流散、殖民戰爭所引起的辯論等等因素，法國人類學的博物館時代才悄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以理論見長的結構人類學。博物館時代所留下的知識遺產由此錯過了一個被客觀檢討的歷史時機，並且被逐漸遺忘。探討博物館對於人類學學科的貢獻和限制，正是晚近人類學史家著手處理的課題。

關鍵詞：法國人類學史 人類學博物館 人類學物件

\* 有關本文所使用的名詞問題，一般有以「人類學」、「民族學」或「民族誌」來指稱相關的研究領域和學科。由於各個時期、各國、各團體或各學者對此領域之範圍和內涵之認知有或自覺、或不自覺的差異，而產生一詞多義與一義多詞的情形。本文主旨既不在於釋辨字義，為行文之便，文中一律使用「人類學」一詞；僅在翻譯機構名稱或引文時，依照原文所使用的名詞作相對應的中文翻譯，因此會出現「民族學」或「民族誌」二詞。特此說明。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一、前言

〈人類學是否需要博物館？〉(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s?)，這是美國學者 William C. Sturtevant 在一九六九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之標題。<sup>1</sup> 在大學人類學系任教，同時又在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轄下的人類學博物館擔任館長的 Sturtevant 當時其實是兼具兩種身分來提出這樣的問題。問題之背景源於一個從一九五〇年代起在美國人類學界屢屢引起討論的現象，也就是人類學博物館所面臨的困境。<sup>2</sup> 當時大部份論者的看法是：人類學的發展實在不需要博物館。理由歸納起來有幾點。第一，人類學博物館的收藏和該學科主要理論的發展脫節。有論者並且認為，即使在演化論或傳播論盛行的年代，二者之間的關係也很薄弱。第二，在人類學尚未進入學院之前，博物館曾經提供給這個學科的先行者一個工作環境。但是，自從大學陸續設立人類學系以後，博物館已經失去其相關角色和功能。第三，從當時（也就是一九六〇年代）的實際情況看來，人類學家在其職業生涯中可以與博物館工作完全無關，學術期刊上以博物館藏品為對象所做的研究比例也很小；可見在人類學博物館工作的人員與大學人類學系的人員已經是兩個不同學術社群的人。

在他的文章裏，Sturtevant 教授從不同的面向綜合地回應了上述這些看法。在文章的前半段，以大學教授立場出發的 Sturtevant，基本上與當時大部份的人類學學者一樣，對於標題所提的問題傾向給予否定的答案。但是在文中後半段換成博物館館長身分的 Sturtevant，則勉強給了一個附加但書的肯定回答。他認為，博物館應該加強其專業功能，提升物質文化方面的研究，並且採納現代博物館的模式，而不是停留在一個「曖昧、陳舊、令人聯想到妓院」(an equivocal and

---

<sup>1</sup> William C. Sturtevant, "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s?" *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82(1969): 619-650.

<sup>2</sup> Sturtevant 所提到的相關文章有十篇左右，主要有 Donald Collier and Harry Tschopik, Jr., "The Role of Museum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5(1954): 768-779; Donald Collier and William N. Fenton, "Problems of Ethnological 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n Museums," *Man* 65(1965): 111-112; Frederick J. Dockstader, "Anthropology and the Museum," in *The Philadelphia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Papers Presented on its Golden Anniversary*, ed. Jacob W. Gruber (New York and London: Temp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67), pp. 132-142 等等，再加上一本由學位論文改寫出版的專書：Hermann Frese, *Anthropology and the public: the role of museums* (Leiden: E. J. Brill, 1960).

petrified institution which reminds one of a bordello) 的機構形象。<sup>3</sup> 只要能達到這些目標，那麼博物館對於人類學還是有幫助的。

除了兼顧正反兩方意見外，Sturtevant 這篇以美、英人類學為主要對象，並旁及歐陸等國概況的文章，還將國際人類學發展歷程劃分為幾個階段。首先是博物館時期 (the Museum Period of anthropology)，時間是一八四〇到九〇年代之間。接下來是博物館與大學並存，但重心逐漸移往大學的時期 (the Museum-University Period)，時間是一八九〇到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二〇年代之後，則是完全以大學為主的時期 (the University Period of anthropology)。<sup>4</sup> 這個以人類學發展的主要機構之嬗替為標準所訂出的分期表，從此也廣為其他研究人類學史的學者所引用。<sup>5</sup>

以這個似乎符合英美人類學發展情況的分期表來檢視法國人類學的歷史發展時，會發現有至少兩點差異之處。除了法國人類學進入大學的時間遲於英美之外，在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巴黎大學設置了第一個負責教授人類學的機構後，人類學博物館仍然是整個學科發展的基地，其份量甚至不減反增。這樣的情形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才因種種因素有了轉變。觀諸法國人類學的異質現象，前述分期表顯然有值得商榷之處，其所依恃的解釋框架亦有待重新思考。

綜合來看，在前述時期針對人類學博物館所寫成的檢討性、呼籲性、建言性文章中有兩個共同點。第一，由於一再強調（並且肯定）博物館最基礎的保存功能，又一再呼籲博物館要發揮其研究功能，這些文章或多或少、不知不覺地將博物館與博物館收藏品劃上等號，相對地忽略了博物館在該學科的建制過程中所發揮的其他功能（詳後）。第二，在討論人類學學科發展與博物館關係時，這些文

<sup>3</sup> Sturtevant 這樣的說法主要是呼應他在文章開頭所引用的法國人類學家 Michel Leiris 文章中的比喻。Leiris 在文章中將博物館與妓院相比，指出二者同樣老舊、曖昧但吸引人的一面。見 Sturtevant, "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s?" p. 619.

<sup>4</sup> Sturtevant, "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s?" pp. 622-624.

<sup>5</sup> 例如在一本專門討論博物館與物質文化研究的論文集，美國著名人類學史家 George W. Stocking 就曾經引用過這個分期並提出小幅修正的意見。George W. Stocking,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ed. George W. Stocking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 3-14. Regna Darnell 以美國人類學為主要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分期：Regna Darnell,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79-1920: From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to Franz Boa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69); Regna Darnell ed.,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4), part 3.

章多以人類學理論的嬗遞來說明人類學的發展。並且因此推論：博物館之所以對人類學無用，乃是因為博物館收藏品與後來陸續發展的新理論無直接關係。

事實上，以這樣的方式來研究法國人類學學科史時，將會遇到一個取徑上的困難。因為一般所熟知的人類學理論中，如演化論、傳播論、功能論、結構主義等等，一直到結構主義之前，幾乎都與法國人類學界無直接關連。其中演化論、功能論與英國人類學家的理論有關，傳播論則是與德、奧語系的一些人類學家的研究有關。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看待法國人類學與博物館的關係呢？若說博物館曾經在人類學的發展初期扮演過重要角色，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又為什麼重要？它在人類學發展史中地位滑落的現象，又是否只用人類學理論發展的角度來解釋就足夠了？此處涉及的其實是以理論演變的角度來理解學科發展本身的有效性問題。以此文討論的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法國人類學領域為例，實際上沒有一個主流理論可以涵蓋當時學者所關切的問題。若以該領域當時最受重視的著作來看，應該討論的或許是 Lucien Lévy-Bruhl 的《原始心態》(*La mentalité primitive*) 一書以及其後續作品。<sup>6</sup> 此書不僅引起當時哲學界、心理學界廣泛討論，也是開明派殖民官員彼此引薦閱讀的一本書。「心態」一詞甚至成為後來年鑑學派推展心態史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時使用的名詞。<sup>7</sup> 但是這位作者及其作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受到普遍批評而逐漸被遺忘。<sup>8</sup> 戰後國際學界對於

<sup>6</sup> 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 從一九〇四年起在巴黎大學教授現代哲學史。其後開始對非西方民族之思維方式產生興趣，於一九一〇年出版第一本人類學的著作 *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討論原始社會的人民如何思考。他認為那是一種神秘的、前邏輯的思考方式，是一種萬物皆相關、無視矛盾存在的理解。從一九一〇到三八年，Lévy-Bruhl 共出版了六本相關的書，討論原始社會人民的自我觀、對超自然的看法、神話、象徵等：*La mentalité primitive* (1922), *L'âme primitive* (1927), *Le surnaturel et la nature dans la mentalité primitive* (1931), *La mythologie primitive* (1935), *L'expérience mystique et les symboles chez les primitifs* (1938)，在當時皆引起廣泛的討論。有關 Lévy-Bruhl 之學術生涯與豐富的政治參與活動，目前尚缺乏完整的傳記，讀者可先參考 Jean Cazeneuve, *Lévy-Bruhl* (Paris: PUF, 1963); Dominique Merllié, "Présentation: le cas Lévy-Bruhl,"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14.4(1989): 419-448; Frédéric Keck, "Les carnets de Lévy-Bruhl: entre philosophie et anthropologie, l'expérience de l'altérité," *Gradhiva* 27(2000): 27-38.

<sup>7</sup> Jacques Le Goff, "Les mentalités, une histoire ambiguë," in *Faire de l'Histoire*, tome III: *Nouveaux objets*, ed.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Paris: Gallimard, 1974), pp. 76-94.

<sup>8</sup> 有關此學者的作品在戰前受到重視以及後來遭到不解之對比，參看 Merllié, "Présentation."



一九三〇年代法國人類學的印象，則完全是受到 Claude Lévi-Strauss（李維史陀）結構人類學盛行之影響，不僅將焦點集中在 Marcel Mauss<sup>9</sup> 身上，並視 Mauss 為結構人類學的先驅；<sup>10</sup> 對其作品的認識也集中在〈禮物〉(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 一文，而忽略其他作品。<sup>11</sup>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來對於 Mauss 作品的重新討論已經指出結構主義人類學將 Mauss 概念僵化的情形。<sup>12</sup> 一些研究者並且認為要瞭解 Mauss 學術概念的全貌，尤其是他所關注的「社會連結」(lien social) 等概念，絕對不能忽視他在政治參與方面留下的文章。<sup>13</sup> 另外也有研究者認為，在 Mauss 的學生所做的研究中最能忠實反映其精神的，可能是後來以考古學為研究重心的 André Leroi-Gourhan (1911-1986)，而不是 Lévi-Strauss。<sup>14</sup> 在這樣的情況下，若要以理

<sup>9</sup> Marcel Mauss (1872-1950) 為社會學家涂爾幹的外甥和學術上的得力助手。Mauss 早年修習哲學、社會學和古語文學，一九〇二年開始在高等實踐研究院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擔任教職，一九三一至四一年並在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講學。有關其生平，可參考目前堪稱最完整的傳記 Marcel Fournier, *Marcel Mauss* (Paris: Fayard, 1994)。

<sup>10</sup> 有關 Lévi-Strauss 對於 Mauss 作品的介紹，見 Claude Lévi-Strauss,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in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by Marcel Mauss (Paris: PUF, 1950), pp. IX-LII.

<sup>11</sup> 此處必須說明的是，Mauss 生前沒有出版任何專著。其寫作的文章數量眾多，篇幅大小不一，除了學術性論文外，經常是以評介、導讀、政論性文章的形式散見於各處。一九五〇年 Mauss 過世時，在社會學家 Georges Gurvitch 的發起下，學界為 Mauss 出版一本論文集：*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收錄了形式較完整的六篇文章，並由 Lévi-Strauss 撰寫導論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其他的學術性文章，則要等到一九六〇年末，由 Victor Karady 編輯出版，共三大冊，約兩千頁：Marcel Mauss, *Œuvres*, vol. 1, *Les fonctions sociales du sacré*; vol. 2,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 et diversité des civilisations*; vol. 3, *Cohésion sociale et divisions de la sociologie*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1968-1969)。至於其政論性文章，則在一九九七年，由 Marcel Fournier 整理出版了一本厚達八百頁的集子：Marcel Mauss, *Écrits politiques* (Paris: Fayard, 1997)。

<sup>12</sup> Bruno Karsenti, *L'Homme total. Sociologie, anthropologie et philosophie chez Marcel Mauss* (Paris: PUF, 1997); Camille Tarot, *De Durkheim à Mauss, l'invention du symbol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9)，尤其是第三十二章。

<sup>13</sup> Marcel Fournier, "Marcel Mauss, le savant et le citoyen," in Mauss, *Écrits politiques*; Camille Tarot,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de Marcel Mauss* (Paris: La Découverte, 2003)。

<sup>14</sup> Nathan Schanlger, "Le fait technique total. La raison pratique et les raisons pratiques dans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Terrain* 16(1991): 114-130; Tarot,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de Marcel Mauss*。

論的角度來瞭解一九三〇年代法國人類學的發展，則必須針對個別學者的著作做單一的討論，如此卻也容易落入見樹不見林的困境，無法探知該學科發展的整體脈絡。所以，與其要勉強依附在某一不存在的統合性理論來瞭解此時期的法國人類學，不如將理論性問題暫時擱置，試著以其他線索來瞭解建制化初期的學者們企圖將人類學建立為一個實證科學 (science positive) 的想法和作為。<sup>15</sup> 分析當時被建設為學科發展基地的人類學博物館便是其中一個可能切入的角度。

為了重新思考上述問題，本文因此將博物館放在整個法國人類學建制化的過程中來討論，分析它在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造成的影響、其特性及其可能的限制；不再是從一般人類學理論發展的角度來否定它的重要性，或把它單純視為是替人類學進入大學做準備的過渡性角色，而忽略它本身原有的意義。事實上，將歷史加以分期原本是研究者歸納觀察所得、方便研究的權宜之計。但是這種分期一旦成為歷史工作者普遍接受而不再懷疑的思維工具 (outillage mental) 時，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影響研究者的視野：原本是一種便於描述的工具，卻變成一種有指引性的解釋框架。不察者甚至不免犯下將前一時期視為下一時期之準備或過渡階段之類後見之明的毛病，或者產生「後來者一定優於先存者」的進步觀偏見。<sup>16</sup> 藉著閱讀與分析奠基者所留下的規劃草稿、會議紀錄、回憶文字等檔案文件，本文試著回歸到建制初期人物之主觀論述，以及他們在客觀環境許可下以博物館為基地所做出之種種實際作為。在這樣的回溯過程後，也許我們甚至可以問，對於當時的建制者而言，「法國人類學是否需要大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也讓我們未來可重新思考大學在法國人類學學科發展中所發揮的真正功能。

<sup>15</sup> Mauss 在當時寫成的文章中，多次顯現建立實證科學的信念。例如在一篇說明自身學術歷程的短文中，Mauss 便自稱是個「只相信事實的實證主義者」(positiviste, ne croyant qu'aux faits)，見 Marcel Mauss, "L'œuvre de Mauss par lui-mêm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1979): 209-220. 在一篇書評中，他對作者建立事實，建立一個實證、理性的社會學的努力表示肯定 (Il y avait un effort louable vers les faits, vers une sociologie positive et rationnelle)，並且明白表示，在建立理論前，年輕的社會學最需要的是個別的實證研究 (plus que toute autre, la sociologie a besoin de travaux spéciaux et positifs)，見 Marcel Mauss, "Compte rendu de G. De Greef, *L'Évolution des croyances et des doctrines politiques*," in Mauss, *Écrits politiques*, p. 70.

<sup>16</sup> Olivier Dumoulin, "Périodisation," in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d. André Burguière (Paris: PUF, 1986); Raphaël Valéry and Olivier Dumoulin, "avant-propos," in *Périodes, la construction du temps historique*, ed. Raphaël Valéry and Olivier Dumoulin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Histoire au présent, 1991), pp. 9-11.

由以上的陳述可知，此篇論文雖是以人類學博物館為主題，但是與前面提到的文章，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一些專論人類學博物館的文章相較，這並不是一篇陳述博物館管理知識、展示技術，或討論博物館倫理，乃至於對博物館的未來有所期許的文章。同樣地，這篇文章的目的也不在於批評過去人類學博物館展示的觀念或意識型態，因為這類的檢討不僅為數已多，而且是文中將談到之奠基者的一些晚輩學生早已著手進行的，若欲深入這方面的討論，必須另文處理，以免偏離本文的主旨。勉強歸類的話，這篇論文的旨趣應該是屬於學科制度史的。然而制度是人所創，為人所用，所衍生出的規訓與獎勵也由當事人來承受或抵抗，所以筆者希望從實際參與者當時的構想及後來的回憶，也就是從他們不同時期的「經驗場域」(champ d'expérience) 和「期待遠景」(horizon d'attente)<sup>17</sup> 所提供的訊息中，進一步還原他們的經驗與期待交融的那個歷史當下 (le présent historique)，並從中分析他們所建立的人類學與法國當時社會、文化環境的關係。

## 二、法國人類學建制化之藍圖與實現

### (一) 藍圖

包含了體質人類學、古生物學、史前考古學、民俗學、語言學等領域的廣義人類學在十九世紀法國相當興盛。<sup>18</sup> 透過自組的學會和期刊，各行各業對此廣泛

<sup>17</sup> 此處乃借用 Reinhart Koselleck 在其探討歷史時間的著作 *Vergangene Zukunft* 中所提到的概念，此處所引用的是法文版：Reinhart Koselleck, *Le futur passé*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0), pp. 306-329.

<sup>18</sup> 有關法國人類學在十九世紀的情況，可先參考 Patrick Menget and Britta Rupp-Eisenreich eds., *L'anthropologie: points d'histoire* [special issue], *L'ethnographie* 79(1983): 90-91; Britta Rupp-Eisenreich ed., *Histoires de l'anthropologie, XVI<sup>e</sup>-XIX<sup>e</sup> siècles* (Paris: Klincksieck, 1984); Elizabeth A. Williams,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sis* 76.283(1985): 331-348; Claude Blanckaert, Albert Ducros and Jean-Jacques Hublin eds., *Histoire de l'anthropologie: hommes, idées, moments* [special issue], *Bulletins et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ns 1.3-4 (1989); Nélia 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1878-1908): anthropologie et muséologie en France* (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91); Claude Blanckaert, "Fondements disciplinaires de l'anthropologie française au XIX<sup>e</sup> siècle: perspectives historiographiques," *Politix: travaux de science politique* 29(1995): 31-54.

領域有興趣的人士彼此分享他們的研究心得。不過，由於其注重觀察、歸納的經驗科學特性與偏重形上思考的大學科系之性質不同，人類學一直沒有能夠得到大學主事者的重視，也一直沒有在大學內設立獨立科系。<sup>19</sup> 長期缺乏人才培養的正常機制，使得該門學問在知識傳承上呈現資源分散、缺乏整合的情形。有感於法國人類學遭到政府的漠視，而在二十世紀初有落後於英、美等國之態勢，致力於此學術領域的人士紛紛提出呼籲，要求當時正在大力鼓吹殖民主義的法國政府正視這門學問的實用效益。在這些為人類學請命的學者中較知名的，包括以鑽研法國民俗學有名的 Arnold Van Gennep、<sup>20</sup> 時任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館長的體質人類學家 René Verneau，<sup>21</sup> 以及從宗教社會學出發轉而對人類學產生興趣的 Marcel Mauss。

當時提倡發展人類學的學者有幾點共同的想法。<sup>22</sup> 一，前人已經累積豐富的藏品，後人不加以發揚光大，殊是可惜。二，殖民擴張的結果對於人類學物件之收集有相當便利之處。一些殖民地數量不比法國多的國家如德國、荷蘭、比利時的人類學家都已經在法屬殖民地進行蒐羅採集。法國本身若不善加利用此機會，可能會讓原屬法國殖民地的文物都落入其他國家的博物館。三，法國在人類學方

<sup>19</sup> Victor Karady, "Le problème de la légitimité dans l'organisation historique de l'ethnologie français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3.1(1982): 17-35.

<sup>20</sup> Arnold Van Gennep (1873-1957) 當時在法國學院中是一個邊緣人物。由於得不到正式教職，他從一九〇五年起在好幾個半學術、半通俗的刊物撰稿，例如 *Revue des idées*, *Revue des études ethnographiques et sociologiques*, *Folklore vivant*, *La Nouvelle revue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Mercure de France* 當中皆可見到他鼓吹人類學重要性的文章。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五年受邀至瑞士 Neuchâtel 大學擔任人類學教授並兼任當地人類學博物館副館長。一九四三到五七年積極推動法國各地的民俗調查，因此被認為是法國現代民俗學的奠基人物。其名著為一九〇九年出版的《過渡儀式》(*Les rites de passage*)。有關其生平及學術貢獻之介紹，可參考 Nicole Belmont, *Arnold Van Gennep: créateur de l'ethnographie française* (Paris: Payot, 1974)。

<sup>21</sup> René Verneau (1852-1937) 早年習醫，後專攻體質人類學，於一九〇九至二八年間擔任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人類學教授，並與古生物學家 Marcellin Boule 主持法國人類學界的主要刊物 *L'Anthropologie* 長達三十六年之久 (1894-1930)。Verneau 大部份的論文與評述文章都發表在這份刊物。有關其生平，可參考 Henri Vallois, "René Verneau," *L'Anthropologie* 48(1938): 381-389。

<sup>22</sup> 見 Arnold Van Gennep,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s enquêtes ethnographiques," *Revue des idées* (Apr. 1907): 314-322; René Verneau,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L'Anthropologie* 29(1918-1919): 547-560; Marcel Mauss,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Revue de Paris* 20(1913)，收入其論文集 Mauss, *Œuvres*, vol. 3, *Cohésion sociale et divisions de la sociologie*, pp. 395-434。

面的研究有落後的危機。當時學者們普遍認為法國原本在這方面的研究有良好基礎，如今卻有落後之勢，應該要急起直追。

儘管各家所見略同，但是因為每位提倡者對於人類學研究範圍的定義不同，所以對學科未來發展規劃的重心也不同。例如 Van Gennepe 看重的是文化人類學方面的研究，希望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徹底切斷關係而獨立發展。這樣的主張使他無法和當時掌握較多資源的體質人類學學者合作，缺乏整合該學術社群的號召力。也因此他偏向與提倡在法國境內和殖民地直接進行風土民情採集的殖民官員合作，卻也因此無法在學院內發揮影響力。由於在法國始終未獲重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即轉赴瑞士發展。

與 Van Gennepe 立場完全相反的，則以一群以體質人類學為廣義人類學領域主流的人士為代表。他們主要的活動場域集中在一八五九年成立的巴黎人類學學會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和一八六七年由上述學會的主持人 Paul Broca (1824-1880) 創立的巴黎人類學學院 (École d'anthropologie de Paris)。對於這些學者而言，人類學就等同於體質人類學，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是附帶的，而且是次要的。由於他們視文化方面的研究為附屬品，因此無法與當時人數漸多的社會文化人類學人士進行充份對話。<sup>23</sup>

相較於上述兩極的看法，二十世紀初法國人類學界不乏有一些折衷派的取向。一九一一年成立，集結了體質人類學、古生物學、社會學、考古學、語言學等方面溫和派學者的法國人類學學會 (Institut français d'anthropologie) 便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上述的 Verneau 和 Mauss 都是這個學會的成員，其他許多成員也在後來大學裏成立的民族學中心 (Institut d'ethnologie) 擔任教師（詳後）。<sup>24</sup> 綜觀這個時期各家對於人類學建制化所提出的建言中，又以 Mauss 所提出的藍圖最為宏觀、最為明確。一九一三年，Mauss 在一篇長達四十多頁的文章中，將當時西方各國的人類學發展作一綜合性的評述，並且指出法國人類學落後之處。<sup>25</sup> 其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執政當局和主管機關正視這個問題。他認為人類學在

<sup>23</sup> Laurent Mucchielli, *La découverte du social, 1870-1914*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1998), pp. 261-291.

<sup>24</sup> 有關這個學會的重要性，目前尚無專文研究。至於其基本運作型態、歷年參與人員和討論主題，可參考戴麗娟，〈從體質人類學到文化人類學：以法國人類學學會為考察對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2-2411-H-001-070, 2004）。

<sup>25</sup> Mauss,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法國原本是「年代久遠的一門科學」(une science d'ancienne date en France)，<sup>26</sup>由於諸多因素而淪入當時停滯不前的處境，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於長期缺乏專門的機關和組織來推動這門學科的發展。他認為，這門學科要迎頭趕上，起碼要有三個機制 (institutions) 互相配合：

一門觀察的科學需要有三個層次的工作和三種機制：就像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和自然地理學等其他在戶外進行的科學一樣，民族誌首先需要田野工作，其次是博物館和檔案館，最後是教學。它必須要有一群不管是專業或業餘的民族誌工作者，他們必須到當地親眼做觀察，而且能夠帶回文件和匯集收藏的材料。這些材料一旦匯集起來以後，就輪到博物館和檔案館負責將之整理、展示和發表。最後，不同程度的教學工作應該讓技術人員、學員、甚或一般大眾能夠充份瞭解這門科學。<sup>27</sup>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 Mauss 提出的建制藍圖，也看到幾點值得後世研究者仔細推敲之處。首先，Mauss 將人類學與「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和自然地理學」相類，認為它們都是在戶外進行的科學，所以需要推動田野工作。至於從事田野工作的人，若無專業者，業餘者亦可。其次，Mauss 提到人類學需要博物館來負責將採集到的材料匯集整理。他並且將博物館與檔案館視為一體。由此可看出深受歷史考據方法影響的 Mauss 視人類學物件為檔案資料的想法。<sup>28</sup> 最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Mauss 提到教學，卻並未特別說明教學工作應該由哪個機構負責？只是提到了教學的對象是「技術人員、學員、甚或一般大眾」。凡此皆提醒吾人不宜輕率地就今日所識之人類學學科定義來看待 Mauss 的規劃，而誤解 Mauss 的關懷重心以及後來建制化過程中歷史偶然介入的成

<sup>26</sup> Mauss,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p. 395.

<sup>27</sup> 同前文，頁420。原文是："Une science d'observation demande trois ordres de travaux et trois ordres d'institutions: tout comme les autres sciences de plein air, la zoologie, la botanique, la géologie et la géographie physique, l'ethnographie a besoin d'abord de travaux sur le terrain, puis de musées et d'archives, enfin d'enseignements. Il lui faut un corps d'ethnographes, professionnels ou amateurs peu importe, mais qui aillent observer sur place, de leurs yeux, qui fournissent les documents et rassemblent les matériaux de collection. Ces matériaux une fois rassemblés, c'est à des musées, à des services d'archives qu'il incombe de les ranger, de les exposer, de les publier. Enfin des enseignements de degrés divers doivent mettre la science à la portée des techniciens, des apprentis, ou même du grand public."

<sup>28</sup> 有關 Mauss 看重歷史研究法，可參考 Tarot, *De Durkheim à Mauss, l'invention du symbolique*, 第六章。

份。反之，我們可以試著從 Mauss 文中提到的傳統和規劃的機制去設想他理想中的發展模式，並進一步和後來實際發生的情形做比較。

若以 Mauss 所提到的三方面工作來檢視當時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工作並非完全沒有進行，但是缺乏持續的推動和有效的整合。先從博物館開始談起。當時法國境內唯一專屬的人類學博物館便是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相較於鄰近的英國、德國人類學博物館，該館成立的年代並不算太晚，正好就是前述 Sturtevant 所言之博物館時期中成立的。不過，在一九〇七、〇八年間一度有意角逐館長職務的 Mauss<sup>29</sup> 在上述這篇長文中對這個博物館的形容是「樣樣缺」：

的確是有不少收藏品，不過卻是一個缺採光、缺展櫃、缺守衛、缺目錄、缺清冊、缺固定標籤、缺像樣圖書室的博物館。<sup>30</sup>

在一八七〇年代，有鑑於法國境內人類學藏品長期分散各處而未有適當管理和研究，<sup>31</sup> 時任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人類學教席 Armand de Quatrefages (1810-1892) 助理員的 Ernest-Théodore Hamy (1842-1908) 因此出面說服政府利用一八七八年萬國博覽會的機會，設立一個專屬的博物館。在幾番波折之後，這個利用博覽會機緣所興建的展覽館舍和展覽物資所成立的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終於在一八八〇年代初期開始開放給大眾參觀。雖然該博物館的成立和展覽受到各方的肯定，也吸引不少參觀人潮，但是不管首任館長 Hamy 如何積極經營，博物館始終面臨經費不足的問題。一九〇八年 Hamy 去世後，該博物館一度面臨暫時閉館與否之議。<sup>32</sup> 後來雖因有心振興人類學的人士力主保留而得以續存，但是其凋蔽的狀況使得激進者如 Van Gennep 甚至以「國恥」(*honte nationale*) 稱之。<sup>33</sup> 這也是為什麼 Mauss 在他的規劃中，仍然將博物館列為需要發展的重點。

<sup>29</sup> 見 Fournier, *Marcel Mauss*, p. 355.

<sup>30</sup> Mauss,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p. 421.

<sup>31</sup> 當時人類學方面的物件散佈在國立自然史博物館、航海博物館 (Musée de la Marine)、國家圖書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砲兵博物館 (Musée de l'artillerie)、聖哲曼古物博物館 (Musée de Saint-Germain-en-Laye)，與自然史、美術、考古等方面的物件一起存放，缺乏專門研究。參見 Ernest-Théodore Hamy, *Les origines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histoire et documents* (1890; Paris: J.-M. Place, 1989).

<sup>32</sup> 有關這個博物館在 Hamy 任內的情況，請參看 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p. 207-255.

<sup>33</sup> Van Gennep,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s enquêtes ethnographiques," pp. 314-322.

在教學方面，當時人類學領域僅有兩個機構勉強負起教學功能。一個是前面已經提過，在一八七六年底創辦、以體質人類學為主的私立學校「巴黎人類學學院」，另一個是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人類學教席。<sup>34</sup> 但是前者的結業證書並非官方承認的文憑，後者本身則不是一個以教學為主的機構，所以根本不頒發文憑，僅提供一般愛好者前往聽講、討論、參觀。在這種情形下，該領域其實不易吸引到年輕學生全心投入，在人才培育方面難免有斷層之虞。也由於缺乏一般大學學科的認證程序，譬如考試、論文寫作或教師會考等等，此領域的知識傳播管道所倚賴的是學會的報告和相關期刊上的發表。人才的來源因此並不穩定，當時人類學研究者泰半是由醫學、自然科學、法學各方面轉行或兼修的學者。即使如此，Mauss 當時似乎也不認為有必要將希望放在大學。因為在這篇文章中，他表示人類學人才在大學裏沒有出路，若硬要讓大學培訓人類學工作者，實有欠周詳考量(imprudent)。他並且認為，在該門科學的基礎建設未成之前，勉強要在大學內設置教席是沒有必要的，因為那有可能變成學究式(scolastiques)的課程計畫，頂多讓一些學者得以維生，對其研究可能一點幫助也沒有。所以他認為，最緊急的是將這門科學組織起來，之後有餘裕再談純教學的問題。<sup>35</sup> 從 Mauss 這段看似零碎的文字，可以歸納出他對大學在人類學建制化中可能扮演之角色的幾點想法。首先，大學教學人類學固然是好的，在當時卻不是最基礎、最必要的。尤其是法國大學內習慣的那種經院哲學式、學究式的講學方式，似乎不是他認為亟待發展的人類學的理想教學方向。此外，Mauss 也隱然指出教與用若無法連結，在大學內虛設教席，對實際的研究不一定會有幫助。

至於田野工作，Mauss 當時對田野工作的想法，其實與現在為人類學社群所普遍接受的田野工作模式相差甚遠。二次大戰以後所通行的模式較接近英國人類

---

<sup>34</sup> Mauss,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p. 420; 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p. 67-72.

<sup>35</sup> Mauss,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p. 420. 原文是："Pour l'instant, l'enseignement de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st une sorte de luxe qu'il n'est point indispensable de se donner. N'ayant aucun poste d'ethnographe à offrir, il serait imprudent à nos Universités de former des ethnographes. D'autre part il n'est guère utile d'installer des chaires avant d'avoir équipé la science elle-même. Ces chaires ne correspondraient qu'à des programmes qui risqueraient de rester scolastiques. À la rigueur elles feraient vivre des savants; il n'est pas sûr qu'elles feraient avancer leurs études. Il est urgent d'organiser la science; on verra plus tard à l'enseigner."

學家 Bronislaw Malinowski 所提倡的參與式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原則，要求一人前往、長期居住、熟悉當地語言、融入當地生活等等。<sup>36</sup> 根據 Mauss 在前述文章中所提到的例子<sup>37</sup>——航海探險時代的遠征探查，包括 François Péron (1775-1810) 和 Pierre Adolphe Lesson (1805-?) 分別在 Nicolas Baudin (1754-1803) 和 Jules Sébastien Dumont d'Urville (1790-1842) 所領導的遠征中從事博物調查的例子——以及他日後在課堂講授時陸續提到的原則，<sup>38</sup> Mauss 當時所設想的田野工作模式乃是以團隊方式進行，甚至是學者與軍隊同步，對於一陌生國度同時進行探勘、記錄和採集的工作模式。這類工作模式最典型的代表是早期自然科學工作者到異地所做的探勘和採集工作。<sup>39</sup> 由於以忠實完整的觀察、記錄大自然事物和現象為主，早期自然科學工作者與當地居民接觸的機會不多，因此較不會產生人文調查時遭遇到的文化衝擊問題。事實上，這樣的田野工作性質可說是博物館工作的延伸，學者進行研究的主要場所是在博物館而不是在田野。此外，由於交通不便，物質條件貧乏，出發到遠方異土做科學調查並非沒有生命危險，所以也不是人人願為、人人能為。這可能也是為什麼 Mauss 會認為不管是專業或業餘的，只要能到異地去做觀察並帶回資料就可以了。當時大部份有機會做田野工作者，都被鼓勵在最短的時間內蒐集最多的資料和文物，並且要將這些資料完整地送回法國本土，放在博物館內做系統化的整理和展示，以提供給大部份未能親身到田野觀察的學者做比較研究。這樣的分工方式，不僅在人力成本上比較經濟，也因為當時多是團隊工作，有互相監督效果，參與者不易因一人主觀判斷而在採集過程中有所偏差。雖然大批人馬進駐一地容易影響當地生活，進而可能影響文化調查結果，但是在田野工作尚未普及於人類學界、實作以自然科

<sup>36</sup> 有關於當代人類學界對於田野工作的原則性要求，可見各類人類學的工作手冊。至於 Malinowski 的田野工作模式在英國人類學傳統中所造成的影響，可參見 George W. Stocking,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Fieldwork in British Anthropology from Tylor to Malinowski," in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ed. George W. Stocking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3), pp. 70-120.

<sup>37</sup> Mauss,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pp. 396-397.

<sup>38</sup> Marcel Mauss, *Manuel d'ethnographie* (Paris: Payot, 1947), chs. 1-2.

<sup>39</sup> Bernard Lepetit, "Missions scientifique et expéditions militaires: remarques sur leurs modalités d'articulation," in *L'invention scientifique de la Méditerranée: Égypte, Morée, Algérie*, ed. Marie-Noëlle et al.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97), pp. 97-116.

學為仿效對象的時代，當時提倡者並未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不過，回到 Mauss 所緬懷的這個傳統來看，二十世紀初的法國確實缺乏如十九世紀上半葉 Baudin 在澳洲 (1800-1804)<sup>40</sup> 或 Dumont d'Urville 在南太平洋遠征 (1826-1829)<sup>41</sup> 所進行的那種大規模採集行動。

綜合以上幾個面向的分析，若依照 Mauss 的意見來理解，以「百廢待興」一詞來形容當時法國人類學領域似乎並不為過。

## (二) 實現

一九一四年，Mauss 的建言原本似乎得到教育主管單位的初步回應。但是大戰旋即爆發，一切建設驟然停擺。<sup>42</sup> 這樣困滯不前的情況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代中期因為政局改變而得到改善。不管是在教學機構、博物館、田野工作各方面都有了新的發展。

一九二四年，左翼聯盟 (Cartel des gauches) 取得執政權。<sup>43</sup> 殖民部長 Édouard Daladier 與當時因為《原始心態》一書引起各界討論的老哲學家 Lévy-Bruhl 曾有師生關係。在聽從各方的意見後，Daladier 決定以殖民部的預算和法

---

<sup>40</sup> Baudin 之遠征，從一八〇〇年十月到一八〇四年三月，總共進行了三年又五個多月。不算那些專門負責船務的海軍軍官、醫生、地理學家、技術人員等一般遠征的基本編制人員，負責科學探勘和採集工作的有二十四個學者，包含天文學家、植物學家、動物學家、繪圖家和照顧植物的園丁等等，最後僅有六個學者生還歸國。由 Cuvier 推薦參加的年輕學者 Péron 便是其中之一。六人中有兩人在回來後不久也因為旅途勞頓而死亡。事實上船長 Baudin 本身也死於此次長途旅行中。此次遠征共帶回兩千多種有用的植物、六百多種植物種子、一百多種活著而且是之前法國不認識的動物。另外還有一千五百多張寫生的臨摹圖。這些標本、文件最後多由 Péron 整理出版。有關此遠征行動，可參考 Jacques Brosse, *Les tours du Monde des explorateurs: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Paris: Bordas, 1983), pp. 95-107.

<sup>41</sup> Dumont d'Urville 的遠征任務從一八二六年四月出發到一八二九年二月歸國，持續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除了船務七十多人外，另有五個自然史學家參與。Lesson 在學者中所擔任的工作是外科醫師兼植物專家。他在參加過幾次遠征後，寫成了關於波里尼西亞居民的起源和遷移方面的研究數冊，在他過世後，於一八八〇到八四年間出版。有關此遠征行動的其他細節，可參考 Brosse, *Les tours du Monde des explorateurs*, pp. 152-160.

<sup>42</sup> Fournier, *Marcel Mauss*, p. 503.

<sup>43</sup> 左翼聯盟是當時幾個主要左派政團的聯盟，社會主義色彩濃厚。在打敗右派取得政權後，該聯盟所組成的內閣作了若干改革，卻因遭到企業界普遍的不滿，總理 Édouard Herriot 在一九二六年即被迫辭職。



國帝國內各殖民政府的部份稅捐收入來支援民族學中心 (Institut d'ethnologie) 在巴黎大學內成立，並且聘請 Lévy-Bruhl 擔任主持人。古典哲學訓練出身的 Lévy-Bruhl 當時是巴黎大學哲學系內德高望重的教授，也是許多具有崇高象徵地位的學術諮詢機構成員。已屆退休年齡的他，在學術和政治關懷上一直是涂爾幹社會學派的盟友。民族學中心雖由他擔任主任一職，實際執行的卻是他的友好晚輩、涂爾幹的外甥 Mauss，以及軍醫出身、當時在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擔任人類學教席助理員的 Paul Rivet。<sup>44</sup> 這兩位學者也就成了中心的秘書，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發生為止。關於這三人組的形成，根據其中年齡最輕的 Rivet 自己的看法，除了有學術上同時涵蓋體質與文化人類學的包容性外，主要還有政治立場上的一致性。<sup>45</sup> 三人在學術上還未建立合作關係之前，在政治參與上就已經表現出相同的理念：在十九世紀末引起社會輿論兩極化的德黑福斯軍官叛國案 (L'Affaire Dreyfus) 中，都是支持該猶太軍官的清白立場，同時也都屬於支持以 Léon Blum 為首之社會主義運動的左派份子。

關於民族學中心，原本 Mauss 的規劃是希望這個中心扮演資訊整理和流通的角色 (clearing house)，不要開課，因為人類學「重要的不是在教，而是在做」(il s'agit non pas d'enseigner l'ethnographie mais de la faire)，Mauss 在他於第一次大戰爆發前交給教育部長的計畫書中這樣表示。<sup>46</sup> 不過在實際進行時，由於包括殖民官員在內許多參與規劃的人士希望能頒發文憑，所以還是順應要求而安排課程講授。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中心初期的課程規劃以編寫工作指南為主，內容乃教導學生到田野採集時所應遵守的原則和所需觀察的事項，可以說是田野工作的行前教育。<sup>47</sup> 民族學中心的建立使得法國人類學從此有了大學裏的第一個正式機

<sup>44</sup> Paul Rivet (1876-1958) 因家境清寒，求學時期選擇就讀里昂的軍校，畢業後並以軍醫為職業。一九〇一年，二十五歲時參加法國到厄瓜多爾測量子午線的任務團，在當地待了五年，累積了許多體質與文化人類學方面的材料。其研究集中在處理美洲原住民的語言、冶金技術、遠古美洲居民的遷徙問題等等。一九〇六年回到法國後，國防部讓他借調到自然史博物館工作，成為 Hamy 與 Verneau 的助手，並在一九二八年成為該館人類學教席教授。有關其生平簡介，可參考 Christine Laurière, "Paul Rivet: vie et œuvre," *Gradhiva* 26(1999): 109-128.

<sup>45</sup> 見 Rivet 在 Lévy-Bruhl 百年冥誕時寫的紀念文：Paul Rivet, "Souvenirs,"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47.4(1957): 418-420.

<sup>46</sup> Fournier, *Marcel Mauss*, p. 504.

<sup>47</sup> 有關這個中心開設的課程：一九二五到二六年的第一個學年度開了四堂課，包括民族誌紀錄工作指南、語言學紀錄工作指南、非洲語言學與民族誌、東亞與大洋州語言學與民

構，擔負起教學的任務，並且積極展開田野調查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由民族學中心促成的第一次大規模遠征調查「達卡—吉布第任務」(Mission Dakar-Djibouti) 終於成行。這個被大多數學者視為法國現代人類學的第一次正式田野調查，<sup>48</sup> 總共耗費了一年多的時間籌劃、集資，行程歷時兩年多，前後共有十個人參與。從西非塞內加爾的達卡一直到東非法屬索馬利的吉布第，為博物館帶回了三千五百多件器物、記錄了三十多種當時歐洲人未曾聽聞過的方言、拍攝了六千多張照片、錄製兩百多捲錄音等等。<sup>49</sup> 任務之成功圓滿，使得從此以後，民族學中心與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所籌辦的遠征採集任務多能得到不同部會的支持，得以順利成行。在一九四〇年發表的一份回顧性文章中，Rivet 宣稱十年之間，由博物館所支持的調查就有百次之多。<sup>50</sup> 事實上，扣除機構間的參訪、考古挖掘，以及殖民官員就近所做的採集等等，其中性質接近文化人類學方面的調查約佔半數左右。

在博物館方面，於一九〇八年接任過世的 Hamy 而成為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館長的 Verneau 在一九二八年必須退休，Rivet 在半數以上自然史博物館教授的支持下，有驚無險地接任 Verneau 的教席以及托卡德侯博物館館長的職位，得以重新規劃此博物館（詳後）。此舉也意味著，民族學中心的主持團隊自此在博物館的事務上也有了主導權，可以更積極地落實他們的理想。

---

族誌。一九二七到二八學年度就增開了異國史前史研究工作指南、人類學工作指南。一九二八到二九學年度更增開了動物與生物人類學、第四紀地質學和人類古生物學、人類與類人類的生理心理學。其後陸續增開了人種生理學、人文地理等課。總計直到一九三九年時，屬於文化人類學和體質人類學的課程比例是相當的。也由於對人類研究的全面性，這個學門很難在大學原有的文、理學院內定位，它是開放給文、理、法、醫學院的學生都可以來選修。只要修業滿兩年，通過考試，並寫出論文，就可以得到大學頒發的修業證書。關於這個中心的其他運作細節，請參考 Tai Li-Chuan (戴麗娟), "L'ethnologie française entre colonialisme et décolonisation" (PhD diss.,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1), ch. 1.

<sup>48</sup> Jean Jamin, "Objets trouvés des paradis perdus: A propos de la Mission Dakar-Djibouti," in *Collections passion*, ed. Jacques Hainard and Roland Kaehr (Neuchâtel: Musée d'Ethnographie, 1982), pp. 69-100.

<sup>49</sup> Paul Rivet and Georges Henri Rivière, "La Mission ethnographique et linguistique Dakar-Djibouti," *Minotaure* 2(1933): 4.

<sup>50</sup> Paul Rivet, "L'ethnologie en France," *Bulletin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2nd ser. 12.1(1940): 38-52.

從這樣的發展來看，Mauss 當初所鼓吹的三個層次的工作，在他與盟友的努力以及左派執政的有利情勢下陸續實現。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法國人類學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照理說，法國人類學在大學內部既然已經有了一個教學機構，應該像英美人類學一樣，從此以大學為發展的基地。但是法國人類學這個時期卻仍然以博物館為組織運作重心，甚至有將教學機構從大學傳統極強之拉丁區遷回博物館所在之十六區的情況。事實上，民族學中心設立後，地址一直設在巴黎大學所在的拉丁區，由大學內稍早設立的地理學中心 (Institut de géographie) 出借一層樓，讓人數還不算多的民族學中心師生作為他們辦公和上課之用。在地處市中心精華地段、沒有美式校園傳統的巴黎大學系統內，這種數個教學機構共用一棟建築的情形可說是常態，民族學中心也沒有被要求遷移。然而在一九三八年，新的人類博物館啟用後，主事者卻主動將這個教學中心從拉丁區遷移到博物館內，用意便是希望民族學中心能與博物館內其他功能做更緊密的結合，使得學生和研究人員可以在博物館享有他們需要的所有相關資源和設備。這樣的作法也受到當時其他領域學者的注意和肯定。在一本一九三七年出版、準備在萬國博覽會期間讓其他領域的學者或外國學者瞭解法國社會科學發展概況的論文集裏，負責介紹人類學、但本身是社會學家的 Raymond Polin 就認為，博物館是該學科的「起點和終站」(origine et point d'aboutissement)。<sup>51</sup>

### 三、從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到人類博物館

#### (一) 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更新工程

一九二八年，Rivet 正式接任館長，並且在众人的推薦下破格聘用當時並無相關學歷背景但已小有策展經驗的文藝界新秀 Georges Henri Rivière<sup>52</sup> 擔任副館

<sup>51</sup> Raymond Polin, "L'ethnologie," in *Les sciences sociales en France: enseignement et recherche*, by Raymond Aron et al. (Paris: Centre d'études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1937), p. 99.

<sup>52</sup> Georges Henri Rivière (1897-1985) 原為古典與爵士皆擅長的專業鋼琴家，在第一次大戰膝蓋受傷後，轉而成為業餘鋼琴伴奏，並開始習讀藝術史課程。在一九二八年策劃「前哥倫布時代美洲藝術展」獲得好評後，在幾位知名的藝術收藏家推薦下，受到 Rivet 重用，成為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的副館長，並從此展開其博物館生涯。在兩次大戰之間，他除了民族誌博物館的實際經驗外，也籌劃法國民俗博物館。曾被年鑑學派創始人

長。在著手進行博物館的更新規劃時，他們是這樣描述所面臨的環境：一個像雜貨鋪的博物館 (magasin de bric-à-brac)，<sup>53</sup> 座落在一個爲了另一目的所蓋的建築物內，陰暗且無暖氣，到處都是臨時安置、無法防塵、防濕和防蟲的展示櫃，既沒有倉庫、工作室、實驗室，也沒有藏品的目錄卡。因爲藏品太多，缺乏足夠的庫房空間，展示場就被當作庫房使用，展櫃、牆壁、地面到處堆滿了藏品。因爲燈光不足、標示不清，大部份的展品無法讓人看清全貌。而且因爲缺乏維修的人力和空間，許多文物都因爲經年累月展出而逐漸損壞。此外，因爲看守人力不足，展品遭竊的事件時有所聞。不僅沒有防盜措施，這個外表壯觀、內部破舊的博物館也沒有任何防火設備。在圖書室部份，空有大量藏書，卻因爲沒有完整的目錄，使得大部份的書無法開放使用。所有這些情況主要是因爲人力和經費不足所造成。事實上，當時整個博物館的人事編制上，僅有一個館長、一個總務、一個守衛長和四個看守人員。人事部份一年預算是六萬九千法朗，其他屬於設備方面的預算是兩萬法朗。<sup>54</sup>

Rivet 上任後首先在組織與管理方面作改革。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將此民族誌博物館正式歸併到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組織內。從此自然史博物館負責人類學教席的教授就自動成爲民族誌博物館的館長。雖然以往該博物館的實際運作情況已經反映了兩館之間的密切關係，但是，依照 Rivet 的說法，以此正式的組織法來明文界定彼此的從屬關係，可以讓民族誌博物館突破原來邊緣孤立的格局，並獲得多重好處。其中之一便是讓該館多出一個副館長的缺額和預算，並且從此也可

---

之一 Lucien Febvre 譽為「博物館學王子」。他在一九四八年成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新成立的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副主任，並在一九五一年成爲主任，直到一九六五年、將近退休年齡為止。除了人類學博物館和民俗博物館，Rivière 同時也是戰後法國生態博物館的推動者。他對博物館的定義、規劃、功能等方面的理念，透過國際博物館協會的工作，對國際博物館界有一定的影響。由於以實務經驗和傳授為主，Rivière 個人所留下的文字說明零散，讀者可參考 Georges Henri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cours de muséologie/texts et témoignages* (Paris: Dunod, 1989), 及一本討論 Rivière 在民俗博物館之建樹的專著：Nina Gorgus, *Le magicien des vitrine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2003).

<sup>53</sup> Paul Rivet, Paul Lester and Georges Henri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Archive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6.12(1935): 516.

<sup>54</sup> Paul Rivet and Georges Henri Rivière, "La réorganisatio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Bulleti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1(1931): 3-11.

以收取門票費。<sup>55</sup> 主事者的理想多少是希望未來門票的收入可以幫助博物館的運作更自給自足。

在館長和副館長的各方奔走之下，政府各部會增加的預算、民間藝術贊助者的捐款、門票收入等林林總總累積起來，使得民族誌博物館的設備預算從一九二八年的兩萬法朗，增加到一九二九年的三十二萬六千法朗。一九三〇年，更增為三十九萬六千法朗。也就是說，兩年之內，增加至將近二十倍之多。<sup>56</sup>

大部份增加的經費都用在博物館的更新工程上。博物館所在的建築體托卡德侯館 (Palais du Trocadéro)，乃一八七八年由 Gabriel Davioud 所設計完成的一個帶有東方主義色彩的建築物，<sup>57</sup> 其圓形的主體外觀十分吸引人，但是內部的空間並不容易規劃。當時的展覽館內，除了民族誌博物館，還包含了比較雕塑館 (Musée de sculpture comparée)，和一個可以容納五千名觀眾的表演廳。Rivet 原本希望另覓場地興建新館，但是在經費有限、場地不易尋覓的情況下，諮詢委員會決定讓博物館留在原來的建築中，但是從原來在旁邊的表演廳轉移一部份空間由博物館運用，並且將屬於法國地區的民俗文物移到他處，等到構想中的法國民俗館成立後再歸為其財產。在原有的硬體限制下，Rivet 與 Rivière 首先改善基礎設備，包括中央暖氣系統、電路系統和消防設備。另外，他們還重新規劃保存和研究的空間，包括庫房、辦公室、專門做修復和消毒的工作室和實驗室，以及圖書室等等。在展場的部份，由於採取地理分佈的架構，比原有的展示空間多增加了亞洲展覽室和比較研究展覽室。同時，他們也替換掉老舊的展示櫃，並增加標籤和說明板等等輔助工具。最後，也是花費最多人力和時間的是藏品和圖書的重新清點和編目工作。根據主事者在一九三五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所提供的數字，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在他們接手時，擁有至少十五萬件藏品，其中只有三萬件左右附有詳細的資料卡。從他們開始執行重整工作後六年間，有三萬零八百三十件器物經過消毒和修復，還有十萬件左右有待清潔整理。他們認為以此規模和工作速度，必須再五、六年才能完成所有的清點和歸檔工作。<sup>58</sup> 以此進度推算，這樣的工作完成時，當時歐陸已經進入第二次大戰狀態了。這恐怕也是 Rivet 等人始料未及的。

<sup>55</sup>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 517.

<sup>56</sup> Rivet and Rivière, "La réorganisatio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 4.

<sup>57</sup> 托卡德侯館是一個圓形主建築兩旁各自伴隨著一個鐘塔，讓人會聯想到清真寺的建築。

<sup>58</sup>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 521.



在物件的收藏和保存上，由於經費有限，這個時期民族誌博物館本身並沒有主動蒐購的政策，只是如往常一樣持續接受各方捐贈。除了原有的探險家、外交官、殖民官、古物收藏家、貴族後代的捐贈，他們特別加強與性質互補的博物館交換。如專門收藏亞洲文物的奇美博物館 (Musée Guimet) 以及擁有大量史前和歷史考古藏品的聖哲曼國家古物博物館 (Musée des Antiquités nationales de Saint-Germain-en-Laye)，都把其藏品中性質比較符合人類學博物館的部份轉讓出來。同時，館方也維持和國外同性質博物館的交流，彼此將重複多餘的藏品捐贈給對方。除此之外，Rivet 和 Rivière 也會利用籌備特展的機會，針對館內藏量不足的地區，鼓勵當地的殖民官員幫忙蒐集。

與先前的主事者相較，Rivet 與 Rivière 特別重視展示的部份。他們不僅特別加強展覽空間的重新規劃，並且不滿足於以往僅有常設展的作法。他們在常設展之外，保留相當空間以作為不定期更換的特展和主題展之用。他們認為特展有多重的好處。首先，「可以引起大眾的好奇心，讓他們覺得這個博物館不再是參觀過一次就夠了，而且讓他們覺得有不斷更新的感覺」。其次，特展也會給博物館帶來增加館藏的機會。因為針對特定主題所舉辦的展覽，會刺激工作人員用各種方式補齊原來文物不足的部份。而且許多展品的所有人在展期結束後，往往會送給主辦單位幾件文物作紀念。最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也會因為特展而必須針對某一地區或某類器物已有的藏品作出清冊，這也是博物館出版圖文並茂之特別館藏目錄的機會，讓其他研究者和一般大眾更能瞭解博物館藏品。<sup>59</sup>

但是特展也意味著需要經常動員人力。事實上，從規劃展覽主題、選擇物品、陳列設計、說明撰寫、編製目錄、開幕、宣傳、人事應酬、看管、保險、閉幕、送還借品等等，每一次策展都需要相當的人力配合。當時民族學中心的學生變成當然的人力來源，這些特展也是他們的實習課程和田野採集的成果展現。這個時期所辦的特展數量不少，從一九三〇到三五年間，特展加上常設展，大約有七十次。<sup>60</sup> 展覽的規模大小不一，展期從數週到數月之久的皆有。有的是學生組團進行田野採集後的成果展現，有的是某個收藏家的特藏展，有的則是動用到許多國家機構的資源，並且邀請總統主持開幕的大型展覽。主題十分多元，大部份

<sup>59</sup>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p. 519-520.

<sup>60</sup> 這個數字是 Nina Gorgus 在其研究中所提供的：Gorgus, *Le magicien des vitrines*, p. 297. 不過這位學者並沒有提供詳細的展覽清單。我個人從目前保存下來的相片、特刊，乃至於報章的報導所整理出來的展覽數是三十多次。

仍與田野採集成果有關。例如前述的「達卡—吉布第任務」，因為工程浩大，動用的設備眾多，經常被拿來與當時雪鐵龍車廠贊助舉辦的「黑色非洲巡航之旅」(Croisière Noire) 相提並論。<sup>61</sup> 其動用的裝備在出發前也成為一次展覽的主題，更不用說帶回的物件，也成了多次展覽的當然展品。這樣的操作慣例也受到其他的業餘愛好者仿效。一九三七年初，當時還在巴西聖保羅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的Lévi-Strauss 也在民族誌博物館的主持下，展出他在一九三五至三六年間在南美洲進行的人類學調查成果。<sup>62</sup> 因為當時博物館的建築已在拆除改建當中，展場的地點因此被安排在歷史悠久的藝評刊物《藝術報導》(*Gazette des Beaux-Arts*) 所屬的藝廊中舉行，但是展覽簡介上仍然註明是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所主辦的展覽。

民族誌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努力似乎受到觀眾的肯定。從門票收入上可以看出這個趨勢。從一開始大約一年三萬法朗的門票收入，年年增長，僅是一九三四年一年之內的門票收入就達到十三萬多法朗。<sup>63</sup>

## (二) 人類博物館 (Musée de l'Homme)

儘管沿用原來的建築體進行博物館的更新工程，Rivet 和 Rivière 仍然希望有朝一日，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能夠擁有一座新的建築，完全按照博物館內部各種工作的需求來設計。在一篇回顧博物館更新工程的文章中，他們提到為了構思新博物館而曾經走訪的博物館。從一九二八到三五年，Rivière 陸續參觀了當時歐美各國著名的人類學或民俗博物館，包括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國、德國、瑞士和美國等地，不下二十處。他們並且認為，這樣願意從零學起、虛心求教的結果，使得在他們手下完成的博物館更新工程，從各方面來看都可以說是當

<sup>61</sup> Jean Jamin, "L'ethnographie mode d'emploi: de quelques rapports de l'ethnologue avec le malaise dans la civilization," in *Le Mal et la Douleur*, ed. Jacques Hainard and Roland Kaehr (Neuchâtel: Musée d'Ethnographie, 1986), p. 53.

<sup>62</sup> 見展覽特刊：*Indiens du Matto-Grosso: guide-catalogue de l'exposition* (Paris: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1937).

<sup>63</sup>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 517. 必須說明的是，這樣的佳績可能是因為該年舉辦了一個大型展覽：撒哈拉沙漠展 (Exposition du Sahara)，開幕酒會即有總統和許多參與機構的代表參加，因此也得到媒體較多的報導（詳後）。

時世界上屬一屬二的人類學博物館典範。<sup>64</sup> 至於他們更大的夢想，也就是擁有一個專為他們的博物館設計的新建築，終於在一九三七年，藉著巴黎藝術與技術萬國博覽會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et des techniques de Paris)<sup>65</sup> 舉行的機會得以實現。

改建後的博物館所在處，從原來略帶東方主義色彩的建築變成新古典主義式。展覽館名稱也從原來隨所在地托卡德侯廣場 (Place du Trocadéro) 之名所叫的托卡德侯館 (Palais du Trocadéro)，變成隨所在地夏約小丘 (colline de Chaillot) 之名，改叫做夏約館 (Palais de Chaillot)。新的建築內，除了這個博物館之外，還有法國古蹟館 (Musée des Monuments français)、航海博物館 (Musée de la Marine)，以及一個現代劇場。<sup>66</sup> 所以若以城市文化空間來看，這個人類學方面的博物館是處在一個博物館群落當中，本身並不孤立。若以全國的角度來看，這個位在首都巴黎的人類學博物館卻是當時全國唯一獨立的人類學博物館，國內其他各省的人類學物件則多散放在自然史博物館、地方民俗博物館或歷史博物館。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博物館當時還被政府賦予督導各省零星人類學陳列室之責任的原因。<sup>67</sup> 這種中央集權、資源集中於巴黎的情況，也使得這個人類學博物館的地位在整個學科發展中更顯重要。同時，以這個博物館為基地所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專業人類學者，在戰後也成了主導全國學院裏人類學發展的人物。這點與地方分權型態的國家如美國、德國、英國發展出來的人類學博物館有所不同。

有了嶄新的面貌後，館長 Rivet 決定將博物館改名為人類博物館 (Musée de l'Homme)，希望它是一個人類的殿堂 (temple de l'Homme)，<sup>68</sup> 在其中可以求取

<sup>64</sup>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p. 520-521. Rivière 尤其受到瑞典人類學博物館的影響，因此注重呈現人類與自然環境之互動。這成為他日後在法國推動生態博物館的源頭。除了北歐的戶外博物館，德國與蘇聯的博物館也是他當時積極考察的對象。

<sup>65</sup> 博覽會的展場就在托卡德侯廣場一直延伸到練兵場 (Champ de Mars) 一帶。原本打算在五月一日舉行的開幕典禮，因為受到社會運動的影響，延遲到五月二十四日才舉行。會期總共有六個月，吸引了大約三千萬的參觀人次。

<sup>66</sup> 一九三八年六月，由政府委託 Rivière 規劃的國立民俗藝術與傳統博物館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et traditions populaires) 設置案成立了一個部門，專門蒐集法國地區的民族學物件。由於專屬的博物館場地不易尋覓，這個部門暫時也棲身於夏約館內，直到一九六八年，博物館在巴黎西邊的布龍尼森林旁落成，才遷移到新址。

<sup>67</sup> 見法國國家檔案館資料，編號 F17 13358 "Notes sur l'organisation de l'ethnologie en France, 1942"。

<sup>68</sup>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 529.

有關人類的所有知識。就像一開始是藉著萬國博覽會的機會而興建的展覽場，人類博物館所座落的這個巴黎十六區，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直屬於一個萬國博覽會、殖民博覽會色彩強烈的地方；是一個新事物、新技術、新知識交流的地方，也是一個兼具普及教育和大眾娛樂的場地。雖然新未必就是好，但是這種開放的精神、展示的傳統、與異文化接觸的開闊空間，讓它從二十世紀初以來，也漸漸變成各種社會運動集結展現之處。因為經濟大蕭條的影響，一九三〇年代層出不窮的工人罷工運動就經常選擇這個地方作為示威遊行出發點。一九三七年博覽會期間，新館兩翼之間的平臺廣場並被命名為人權廣場 (*esplanade des Droits de l'Homme*)。原本計畫在此次博覽會期間開幕的人類博物館也因為工人罷工而延遲一年。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開幕的人類博物館延續原有的規劃，並且多增加了演講廳和電影放映室，連館長在頂樓也佔有一個公務宿舍，使得 Rivet 的公、私生活全在這個博物館裏。事實上，有高度政治參與行動的他，與 Lévy-Bruhl、Mauss 一樣，都將學術上反種族歧視的理念在公共事務上加以實踐。Rivet 不僅在一九三五年代表社會黨參選市議員成功，並且參與許多重要的反法西斯主義組織，例如一九三四年春天由兩千多名教師、藝術家、知識份子組成的反法西斯知識份子警戒委員會 (*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專門對抗右派份子所組織的行動。第二次大戰期間，德軍全面佔領巴黎後，因為人類博物館原先工作人員中有猶太人，並有人員涉嫌參加抗德地下組織，<sup>69</sup> 在一九四一年二月，蓋世太保派員擒捉館長時，就是直接進入博物館的寓所內搜捕。所幸當時他早一步離開，接受哥倫比亞總統 Eduardo Santos 的邀請到該國避難，一方面在波哥大大學教書並協助組織人類學研究中心，一方面加入戴高樂領導的海外抗德行動。

<sup>69</sup> 以人類博物館為基地的抗德聯絡網 (*réseau de résistance du Musée de l'Homme*) 於一九四〇年十月，由 Rivet 與部份館員和學生一起成立。聯絡網被偵破後，除了 Rivet 流亡海外之外，有兩名學生兼助理人員 Anatole Lewitzky、Boris Vildé 在逃亡過程中遭到蓋世太保逮捕後槍決，多名參與者被送到集中營而犧牲。有關人類博物館和法國人類學界在第二次大戰中的抗德行動，可參看 Martin Blumenson, *Le réseau du Musée de l'Homm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79); Daniel Fabre, "L'ethnologie française à la croisée des engagements (1940-1945)," in *Résistance et résistants*, ed. Jean-Yves Boursier (Paris: L'Harmattan, 1997), pp. 319-400.

就像 Mauss 將人類學博物館當作檔案館看待，認為博物館應該負起保存法國殖民地不同種族文化遺產的責任，<sup>70</sup> Rivet 對於自己所主持的博物館之收藏與展示原則，也有明確的去菁英化、文化平等的概念。對他來說，這不僅是科學研究上的需要，也是個人的政治信仰：

對於民族學家而言，窮人的房子比起富人的宮殿，若非更加、起碼是一樣珍貴的。在他的眼裏，再不起眼、再不完美的工具，再粗糙不過的陶器比起裝飾精巧的花瓶，若非更有、起碼是一樣有研究價值的。只有在某個地區一般文化狀態的基礎上，我們才可以做比較。若認為只有在稀有罕見的器物分佈研究上才能得到有用的結論，那就大錯特錯了。<sup>71</sup>

在那個納粹德國標榜亞利安種族優越感的年代，從一九二九年就參與該博物館工作的 Michel Leiris 在晚年的一次訪談中肯定地說，Rivet 將人類博物館營造成一個「反種族主義又受大眾歡迎的」博物館。<sup>72</sup>

#### 四、人類學博物館的四種角色

一九三一年，在一份未發表的規劃草稿裏，Rivet 與 Rivière 梗概地陳述他們理想的博物館所應具備的功能。他們認為人類學博物館應該要扮演四種角色，也就是發揮四種功能。分別是科學上的功能 (un rôle scientifique)、普及教育的功能 (un rôle éducatif populaire)、藝術上的功能 (un rôle artistique)，和為國奉獻的功能 (un rôle national)。<sup>73</sup>

在科學功能方面，他們強調的是博物館的保存和研究功能。他們認為博物館的收藏對於研究者而言是個取之不盡的寶庫，因為，「很少有風俗習慣不會透過物件被實質存留下來」(il est en effet bien rare qu'une coutume ne soit pas en quelque sorte matérialisée par un ou des objets)，<sup>74</sup> 而博物館的任務就是要蒐集保

<sup>70</sup> Mauss,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p. 433.

<sup>71</sup> Paul Rivet, "L'étude des civilisations matérielles: ethnographie, archéologie, préhistoire," *Documents* 3(1929): 133.

<sup>72</sup> Jean Jamin, "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Paul Rivet (1876-1958)," *Bulletins et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3-4(1989): 277-294.

<sup>73</sup> 這份文件後來經過負責整理一部份檔案資料的 Jean Jamin 公開，刊於《托卡德侯博物館通訊》的重印本中。Jean Jamin, "Préface: tout était fétiche, tout devint totem," in *Bulleti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aris: Éditions Jean-Michel Place, 1988), p. xvii.

<sup>74</sup> Jamin, "Préface," p. xvii.



存這些物件，包括相關的解釋和說明，以供學者研究。所以，博物館也是學生最好的實習場所。

整修完成的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除了有後來遷入的、專門教學和編撰工作指南的民族學中心之外，也是多個學會的會址所在。包括前面提過，以綜合研究爲主的法國人類學學會 (Institut français d'anthropologie)、法國史前史學會 (Société préhistorique française)、一八九五年就成立的美洲研究者學會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一九三〇年成立的非洲研究者學會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和一九三七年左右成立的大洋洲研究者學會 (Société des océanistes) 都在博物館內定期聚會，各學會的學報也以博物館爲根據地發行。若再加上博物館本身發行的《托卡德侯博物館通訊》(*Bulleti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和民族學中心主辦的《民族學中心專著》(*Travaux et 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thnologie*) 叢書系列，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提供給這個學術社群的成員一個良好的資訊交流和論文發表的園地。

在教育功能方面，除了前述的研究和教學功能之外，館長與副館長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大眾教育。Rivet 認爲，對於整個社會而言，博物館不僅是人類學的「櫥窗」(vitrine)，甚至是「論壇」(tribune)，是「人類學知識對社會介入的場所」(lieu d'intervention du savoir ethnographique sur la société)。<sup>75</sup> 對於廣大的勞動大眾而言，實物教育比文字教育更容易被接受。這也是爲什麼他們一直強調一個理性的、有秩序的、富於說明力的陳列方式之重要性。這樣的想法，不僅表現於他們在博物館的內部工作上，也表現在他們的社會參與上。Rivet 與 Rivière 皆是人民陣線時期 (Front populaire) 創辦的全民博物館之友協會 (Association populaire des amis des musées) 的幹事，而該協會的刊物《生動博物館》(*Musée vivant*) 也會定期介紹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的展覽或演講活動，並且安排免費的導覽或特展開幕日的特別參觀活動。<sup>76</sup> 由於其政治傾向的關係，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主持團隊尤其希望該館活動能深入到勞工階級、教師和學童的實際生活

<sup>75</sup> Jean Jamin,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en 1930," in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p. 114.

<sup>76</sup> 一九三七年創立的全民博物館之友協會屬於人民陣線的文化推廣組織之一。人類博物館的工作團隊與此協會關係密切。館長 Rivet 與其學生 Soustelle 都曾經在其中擔任總幹事，Leiris 也參與協會刊物的編輯工作。有關此協會在整個人民陣線政府的文化政策裏扮演的角色，可參看 Pascal Ory, *La belle illusion: culture et politique sous le signe du Front populaire, 1935-1938* (Paris: Plon, 1994), pp. 249-267.

中。在全民博物館之友協會的通訊第一期便採用 Rivet 的學生 Jacques Soustelle (1912-1990) 的一篇文章。這位自比為「博物館技工」(technicien du musée) 的知識份子在文中談到：現代博物館不該總是停留在被動、消極、只有少數愛好者才去的地方，而是應該採取主動出擊的步驟，使博物館真正成為「人民的博物館」。在他的理想中，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不該總是期望人民走向博物館的單向行動，而應該是博物館走向人民，主動在各個城鎮、鄉村、殖民地舉辦與博物館有關的活動，包括為工人階級特別安排免費的晚間參觀活動，或安排學生團體戶外教學，或安排巡迴借展等等。<sup>77</sup>

有關藝術功能方面，由於副館長 Rivière 和學生 Michel Leiris 本身的背景，當時許多藝術的愛好者，尤其是前衛藝術的創作者對博物館的活動並不陌生。也由於 Rivière 的請託，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之友會 (Société des amis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從他們開始主持該博物館後，邀請到許多貴族或知名的藝術品收藏家和藝品古董商來參加，並且輪流擔任會長。<sup>78</sup> 本身就贊助多位藝術家並且曾在布紐爾 (Luis Buñuel) 的前衛影片《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 一片中客串演出的子爵 Charles de Noailles 和夫人 Marie-Laure de Noailles 就是其中最忠實的贊助者之一。收藏家和現代藝術贊助者 David David-Weill 和 Georges Wildenstein 也經常出席該博物館的活動，並且在他們主持的刊物中幫忙宣傳。<sup>79</sup> 此外，一些當時知名的藝品商如 Paul Guillaume、Charles Ratton、André Leval、Louis Carré 都曾經出借藏品或籌辦展覽。在這個爵士樂、歌舞秀 (music-hall)、超現實主義流行的「輕狂年代」(les années folles)，異文化的元素受到前衛藝術家、實驗藝術家的廣泛注意。所謂的「原始社會」、「原始心態」、「原始藝術」，逐漸擺脫過去極度低劣的地位而開始

<sup>77</sup> Soustelle 這篇文章原本是刊登在一份新聞性的週報 *Vendredi*，後來被轉載於《全民博物館之友協會通訊》的創刊號上，見 Jacques Soustelle, "Pour une culture populaire,"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populaire des amis des musées* 1(1937): 1-2.

<sup>78</sup> 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之友會其實在一九一四年就已經成立，但是一直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這樣的情形直到一九二八年，子爵 Charles de Noailles 受到 Rivière 請託開始擔任會長後才改善。一九二八到三五年間，該會總共為博物館籌得五十萬法朗的經費。參看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 517.

<sup>79</sup> Georges Wildenstein (1892-1963) 從一九二六年開始就主持當時最老牌的藝術刊物 *Gazette des Beaux-Arts*，一直到他過世為止。

帶有正面的意義。<sup>80</sup> 雖然當時 Rivet 等人想和某些藝廊將人類學物件藝術品化的作法畫清界線，他們和合作的學者們仍不否認，在鼓勵一般大眾關心原始文化這件事上，「藝品商和收藏家是學者們有用的助手」。<sup>81</sup> 重新出發後的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便在這樣的氛圍裡，成為一個科學界與藝術界交流的場所。<sup>82</sup> 這個時期內，該博物館所舉辦的某些展覽不僅有總統來剪綵，其開幕酒會更成了巴黎名流經常出席的社交場合。

至於對國家的貢獻，在主事者的眼裡，指的是幫助殖民事業的改革和增進法國境內人民對殖民地人民的認識與瞭解。事實上，不僅民族學中心在巴黎大學的創立受到殖民部的資助，博物館的改建工程也得到各地殖民政府編列給母國殖民科學事業發展預算的支持。一些與 Lévy-Bruhl、Mauss 或 Rivet 合作關係良好的開明派殖民官，也是民族學中心理事會之成員。他們並且鼓勵自己任教之殖民官訓練學院 (École coloniale) 的學生，選修民族學中心的課程，以提升本身的研究。由於是民族學中心的學生，這些年輕的殖民官也和其他學生一樣，經常參與博物館展覽的籌備工作。他們本身在殖民地執行公務之餘所蒐集的物件，也在館長 Rivet 的鼓勵下捐給博物館。<sup>83</sup> 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在這段時期內所舉辦的展覽中，不乏與法國殖民事業有直接相關的展覽。雖然政府在一九三一年殖民博覽會期間，於巴黎東南方文生森林旁 (Bois de Vincennes) 成立了一座真正屬於

<sup>80</sup> Jean-Louis Paudrat, "Afrique," in *Le primitivisme dans l'art du XX<sup>e</sup> siècle*, ed. William Rubin (Paris: Flammarion, 1987), pp. 125-175. 這位作者認為這個轉變大概是在一九〇六到二〇年間發生的。

<sup>81</sup> Brunon Guardia, "Opinions de MM. François Carnot, Raymond Koechlin, Georges Salles," *Les Cahier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39(1928): 82.

<sup>82</sup> 法國人類學與超現實主義交會的這段歷史，曾經引起美國人類學家 James Clifford 的興趣，並且為文討論，參見 James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 4 "On Ethnographic Surrealism." Clifford 認為這時期的超現實主義與人類學有本質上的相通性，彼此作了完美的結合，同時激起了耀眼的火花，他並且用 Ethnographic Surrealism 一詞來形容這段時間的超現實主義。法國人類學史學者，也是 Michel Leiris 的遺囑執行人 Jean Jamin 並不完全贊同這個論點，他甚至認為那是雙方的一個「誤解」(un malentendu)。見 Jamin, "L'ethnographie mode d'emploi."

<sup>83</sup> Rivet 在這方面與殖民官員們的接觸，可參考文件例如：Paul Rivet,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ethnologiques," in *Congrès des recherches scientifiques coloniales*, ed. Association Colonies-Sciences (Paris: Association Colonies-Sciences, 1931), p. 1.

殖民部管轄的博物館——殖民地博物館 (Musée des Colonies)，<sup>84</sup> 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嚴格來說並不是一個殖民博物館；但是由於它的名聲響亮，它所舉辦的展覽自然也吸引較多的參觀者，在建立法國殖民帝國的正面形象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而鼓吹殖民人道主義的館長似乎也不排斥自己主持的博物館被當作殖民博物館。<sup>85</sup> 由於這個緣故，殖民官員、其家屬和朋友也成了這個博物館的常客。事實上，由於廣義人類學長期未受到教育當局的重視，許多相關機構的發展往往是靠著私人贊助和業餘愛好者自發的組織。二十世紀上半葉，法國殖民事業蓬勃發展之際，殖民官員也較有規模地加入這個行列。博物館的展覽正是回饋給贊助者或藏品捐贈者的一個好機會。受到各方贊助而得以成行的遠征採集者藉此展示工作成果，而贊助者，不管是官方或私人，不管是出錢、出力或出物，都有在展覽特刊上留名、在公開場合被感謝、在媒體被正面報導的機會。博物館的展覽成了人類學學者同行之間、與贊助者之間，乃至於與一般大眾之間，一個重要的學術交流所在 (lieu de sociabilité)，一個促成共識的重要場所，在傳播人類學重要性的觀念上因此起了一定的作用。

雖然該博物館主持團隊的規劃草稿是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分別地陳述這四項功能，但在實際的操作和最後的效果中，這些功能往往是相輔相成的。以一九三二年舉行的貝南王國青銅與象牙雕刻展 (Bronzes et ivoires du royaume du Bénin) 為例，多少可以瞭解一次展覽所能達到的多項功能。該展展期一個月（六月十五日 至七月十五日），吸引了大約一萬人次的參觀人潮。<sup>86</sup> 在展覽的規劃方面，由一

---

<sup>84</sup> 藉著一九三一年國際殖民博覽會在巴黎舉行的機會而設立的殖民地博物館，在一九三五年改名為海外法國博物館 (Musée de la France d'outre-mer)。殖民地解放運動之後，海外法國博物館順應時勢，在首任文化部長 André Malraux 的主導之下，更名為非洲與大洋洲藝術博物館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並且歸屬於文化部管轄，直到一九九〇年，又改為屬於國家博物館聯盟管轄。不過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以及後繼的人類博物館，的確使得海外法國博物館失色不少。關於這兩個博物館在殖民文化方面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探討的文章不多。目前可參考的有 Dominique Taffin, "Du Musée de la France d'outre-mer a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 1960-1980," in *Le musée et les cultures du monde, Les cahiers de l'École nationale du patrimoine* 5 (Paris: École nationale du patrimoine, 1999), pp. 113-127.

<sup>85</sup> Benoît de l'Estoile, "From the Colonial Exhibition to the Museum of Man: An Alternative Genealogy of French anthropology," *Social Anthropology* 11.3(2003): 358.

<sup>86</sup> Georges Henri Rivière, "L'art du Benin a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Afrique française*, July 1932.

位常年在法屬西非地區工作、並且和博物館團隊有密切合作關係的殖民官 Henri Labouret 負責科學部份的展品挑選，知名的藝品商 Charles Ratton 則負責藝術方面的展品規劃。另外，展覽特刊的序言則請當時法屬西非的總督 Jules Brévié 來撰寫。<sup>87</sup> 同時，由於博物館本身在這個領域的藏品並不多，這次的展覽主要是倚賴私人收藏家的贊助和外國博物館的借展。<sup>88</sup> 博物館主持人之用意乃希望藉此展出，讓法國民眾認識這些大家通常十分陌生的器物，刺激未來相關物件的採集工作。這樣一個展覽因此同時吸引了藝術愛好者和殖民官員，也達到了大眾教育和豐富館藏的科學功能。

一九三四年舉行的另一個大型展覽：撒哈拉沙漠展 (Exposition du Sahara) 也一樣可以說明此時期博物館這種學術與政治、社會、文化互涉的現象。從五月十五到十月二十八日舉行的這個大型展覽，不僅邀請到總統來作開幕剪綵，前後共吸引了九萬人次參觀。<sup>89</sup> 展覽內容包括撒哈拉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動、植物群像，生活於其中的民族，法國在當地的開發經營過程等等，由此可以推測該展覽對於形塑法國一般民眾的「撒哈拉印象」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展覽籌劃工作一開始就得到當時法屬阿爾及利亞總督 Jules Carde 的全力支持，並陸續得到法國六個部會（內政部、外交部、戰防部、航空部、教育部、殖民部）的協助，義大利殖民部、英國、德國多個地理學會的參與，以及法國或外國博物館的藏品借展。此外，許多學術機構，包括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巴黎大學的藥學院、地理中心也都在支援的行列之中，既出借藏品又幫忙撰寫展品說明。<sup>90</sup> 爲了彌補博物館所缺乏的物件，主持團隊特別編寫了《人類學文件和物件收集工作指南》(*Les instructions détaillées pour le rassemblement des documents et objets ethnographiques*)，發給駐派在撒哈拉沙漠及鄰近地區的殖民官兵，請他們幫忙蒐集運送。可見官方的支持對於當時好不容易有了制度基礎的法國人類學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至於這些合作關係是否會致使學術失去中立立場，還必須要多層面的分析，未必如一九六〇年代後一些批判戰前人類學與殖民關係的論述所言地那般想當然耳。

<sup>87</sup> 見人類博物館 Paul Rivet 的書信檔案 (Fonds Rivet correspondance) 中，Jules Brévié 給 Rivet 的信。

<sup>88</sup> “Chronique du musée,” in *Bulleti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 59.

<sup>89</sup>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 520.

<sup>90</sup> 見展覽特刊 *Exposition du Sahara: guide illustré* (Paris: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1934).



事實上，從以下的事例可以看出，當時新養成的人類學家在殖民地事務上可以有獨立發言的空間，甚至有取代殖民官員而受到帝國中心媒體重視的趨勢。由於副館長 Rivière 懂得透過媒體傳達理念，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當時一些重要的展覽不僅有路線不同的文藝性刊物，如 *Cahiers d'Art*、*Minotaure*、*Comœdia* 加以報導，<sup>91</sup> 也曾經成為電影院放映劇情片前的新聞影片主題。另外，Rivière 也曾經受邀到廣播節目宣傳新的展覽，鼓勵大眾到博物館參觀。從一九三七年底、三八年初兩次談論「海外法國人民」(*Les populations de la France d'outre-mer*) 的廣播節目之安排可看出，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訓練出來的學生的專業性逐漸被注意，在媒體上正慢慢地取代以往傳道士或殖民官員的角色，而被認為是可以介紹殖民地人民的專家，甚至成為殖民地人民與文化在帝國中心的代言人。<sup>92</sup>

靠著這個學術社群的努力，此時期的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的確吸引了不少原本對人類學毫無認識的人開始對這個學問產生興趣。不過，這些有助於落實博物館大眾教育功能的活動，並沒有讓主持團隊忘記該博物館首要的功能還是科學方面。事實上，Rivet 和 Rivière 在一九三〇年代中期開始規劃即將興建的博物館時，就提出博物館—實驗室 (*musée-laboratoire*) 的概念。在深入探討這個概念的可能意涵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人類學博物館所收藏的物件之特性。

## 五、人類學物件之特性、分類和展示

與 Hamy 和 Verneau 主持的時代相較，一九三〇年代的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在 Rivet 與 Rivière 努力下，配合當時歷史時空的有利因素，的確有了一番

<sup>91</sup> 另外像 *Les Cahier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Le Figaro artistique*, *Les Nouvelles littéraires*, *Europe nouvelle*, *Les Cahiers de Belgique*, *L'Intransigeant*, *Afrique française* 等報刊雜誌也刊登過 Rivière 的宣傳短文。參看 Christine Laurière, "Georges Henri Rivière au Trocadéro: du magasin de bric-à-brac à la sécheresse de l'étiquette," *Gradhiva* 33(2003): 61.

<sup>92</sup> 在巴黎廣播電台 (Radio-Paris)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次節目中，Paul Rivet 負責開場白、Thérèse Rivière 介紹阿爾及利亞、Théodore Monod 介紹撒哈拉沙漠、Marcel Griaule 介紹法屬西非、Léon Pales 介紹法屬赤道非洲。一九三八年二月的一次節目中，Robert Montagne 介紹敘利亞與黎巴嫩的居民、Paul Dubois 神父介紹馬達加斯加島居民、Pierre Gourou 介紹法屬印度支那、Jacques Soustelle 介紹安地列斯群島居民、Edgar Aubert de la Rüe 介紹南太平洋新赫布里底島。參看 *Les Cahiers de la Radio-Paris* 12 (Dec. 1937); 29 (Feb. 1938)。

新氣象。不過，在人類學博物館裏一項基礎工作的概念，也就是人類學物件 (objet ethnographique) 的分類和研究上，Rivet、Rivière 乃至於 Mauss 的觀念，與創始館長 Hamy 時代的想法，其實有相當的延續性。<sup>93</sup> 爲了進一步瞭解他們所依循的傳統，以便探知他們的創新處，我們必須回溯到 Hamy 時代流傳的觀念和作法。

一八七〇年代積極爭取人類學專屬博物館成立之際，Hamy 做了許多相關資料的收集和考證，希望從前人的經驗和想法中整理出一套可參照的作法。<sup>94</sup> 有關於人類學物件分類陳列所應該依從的原則，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相關的學者在鼓吹建立專屬的人類學博物館時就提出不同的分類原則。雖然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歐洲尚未有人類學博物館前，在戈廷根、柏林、慕尼黑等地已經陸續出現將人類學藏品集中保存、形成系列收藏 (collections) 的作爲，但是根據 Hamy 的整理，他認爲最早明確地討論人類學物件之特性，並試圖提出分類的有兩位學者，一位是曾經參與拿破崙所領導之埃及遠征團的法國地理學家 Edme-François Jomard (1777-1862)，另一位則是與 Jomard 有所交流的醫師兼植物學家 Philippe-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sup>95</sup> 這兩位學者都不滿當時還流傳的貴族奇珍室 (cabinet des curiosités) 內那種爭奇鬥豔、毫無章法的陳列方式，而是強調人類學物件在研究人類活動歷史時可能提供的珍貴訊息，並且進一步思考應該如何有系統地整理這些龐雜的物件，使它們更能發揮科學研究上的價值。他們因此模仿自然史的作法，參照十八世紀末以來逐漸定型的生物分類架構：界 (règne)、門 (embranchement)、綱 (classe)、目 (ordre)、科 (famille)、屬 (genre)、種 (espèce) 的分類方式規劃出一套適合人類學物件的分類架構。

<sup>93</sup> 見 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Jean Jamin, "Les objets ethnographiques sont-ils des choses perdues?" in *Temps perdu, temps retrouvé*, ed. Jacques Hainard and Roland Kaehr (Neuchâtel: Musée d'Ethnographie, 1986), pp. 51-74. Rivière 在一開始加入博物館工作的一篇文章裏就引用了 Hamy 在一八八九年出版的書：Georges Henri Rivière,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Documents* 1(1929): 54-58.

<sup>94</sup> Hamy, *Les origines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Hamy 此書不僅是繼任的人類學博物館工作人員會引用，後來研究人類學與博物館之關係或人類學博物館史的學者也多會引用。例如 Frese, *Anthropology and the public*; 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William Ryan Chapman, "Arranging Ethnology: A. H. L. F. Pitt Rivers and the Typological Tradition," in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pp. 15-48.

<sup>95</sup> Hamy, *Les origines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pp. 229-265.

一八三一年，Jomard 第一次提出成立專屬人類學博物館來處理大航海時代所帶回法國的相關物件時，便試著將人類學物件與藝術品、自然史物件、考古出土物件做初步區分，藉以剖析前者的特性，以說明專屬博物館有存在的必要性。相對於藝術品是以美感與稀有為特性，Jomard 認為人類學物件則是以其「實際生活與社會用處，經濟與技術用途」(*utilité pratique et sociale, l'usage économique et technologique*) 上的表現來考量，而且基本上是工藝技術的產品 (*produits des arts industriels*)。與自然史博物館所負責收藏的自然界動、植、礦物標本相較，人類學物件是一些「經過人為加工，或為了經濟或家務之目的，或因社會、宗教、軍事等用途而產生的物件」(*objets ayant été travaillés pour servir soit à une destination économique ou domestique, soit à un usage civil, religieux ou militaire*)，而不是天然物。至於與考古出土物件有別之處在於，考古出土之物包含了遠古人類的天然和人工物，人類學物件則是屬於近代人類生活所用的物件。<sup>96</sup>

為了滿足研究的需要，Jomard 也認為純粹的累積收藏是不夠的，必須要有一個有條理、次序的分類，以方便學者作比較研究。為此，Jomard 主張依照物件之用途和目的 (*selon leur usage et leur destination*) 來作為分類的依據。<sup>97</sup> 在這個原則下，按照人類食、衣、住、行、防衛、娛樂等面向的需求來分類整理。在這些大項下，才依照部落和地區來排列。<sup>98</sup> Jomard 的假設是人類生理需求的共通性會導致各地人類發展的一致性，但是，各地人民卻發明出不同方式、製作出不同器具來因應同類的需求，因此值得做比較研究。另外，以物件之用途來分類，而不以地理區域劃分，Jomard 所考量的還有藏品數量本身的限制。因為不分年代和地域，博物館在每個類別項下總會有一些藏品，卻不一定有世界上每個

---

<sup>96</sup> Edme-François Jomard, *Considérations sur l'objet et les avantages d'une collection spéciale consacrée aux cartes géographiques et aux diverses branches de la géographie* (Paris: Imprimerie de E. Duverger, 1831), pp. 15-19.

<sup>97</sup> 原文是：“Quant au classement des objets, il devrait être fait dans un ordre méthodique et non dans l'ordre géographique, pour offrir aux recherches un plus haut degré d'utilité. C'est d'après la nature des choses, c'est-à-dire *selon leur usage et leur destination*, et non d'après l'ordre des lieux et l'espèce de la matière qu'il faudrait les distribuer. L'on placerait donc à la suite les objets du même genre, en usage chez les diverses peuplades, sous-divisées elles-mêmes d'après un ordre géographique constant.”

<sup>98</sup> 在一八三一年提出第一份分類原則後，直到一八六二過世那年，Jomard 又修改了幾次他的分類表。目前一般所知的是他最後修訂的版本。

地區的藏品。若依照當時藏品的來源和規模來看，博物館將會面臨有些地區的藏品過多、有些地區幾乎沒有藏品可以呈現的懸殊情況。<sup>99</sup>

出生於德國、長期居住於荷蘭、又有深入的日本生活經驗的 von Siebold，對於人類學物件的看法，與 Jomard 有相通之處。<sup>100</sup> 首先，他也強調人類學物件的特殊性，且認為即使是與其關係密切的考古物件都不應該混合置於同一博物館內。他認為考古物件處理的對象是遠古人民，人類學物件則應該是針對當代還在活動的族群；一個是屬於在時間軸向上的探索，另一個則是空間軸向上的研究。此外，他也認為，相關比較研究的成果好壞，完全取決於所蒐集物件品質的好壞和分類系統的關係。在分類原則上，他主張先以地區、族群來劃分，並依照物件本身的材質（石器、陶器、骨器、木器、皮毛等等）和所運用的製作技術來區分陳列。依此分類架構來看，von Siebold 較注重的似乎是找出各個地區人民之間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曾經產生的接觸、建立的關係和遷移的痕跡；<sup>101</sup> Jomard 的分類架構則便於同類器物間的比較研究。<sup>102</sup>

後來各國開始有專屬的人類學博物館出現後，大部份的分類系統都是從 von Siebold 和 Jomard 所建立的原則加以變化。<sup>103</sup> 例如著有《人類文化通史》(*Allgem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的 Gustav Klemm (1802-1867) 在為萊比錫人類學博物館（一八七二年成立）構思時所採用的就是 Jomard 的分類原則。而在英國的 Augustus Henry Lane-Fox Pitt Rivers (1827-1900) 則是偏好 von Siebold 的觀念，用物件原有的性質來分類陳列。在美國，負責管理華盛頓國家博物館裏人類學部門的 Otis T. Mason (1838-1908) 因為受到傳播論的影響，亦傾向融合 Jomard 和 Klemm 的分類觀。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第一任館長 Hamy 則主要是以 Jomard 的分類為基礎加以運用。<sup>104</sup>

綜合來看，從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初累積有幾種不同分類陳列的作法。一種方式是依照器物之用途來分類，在展示時又依其形制，從簡單到複雜、從同

<sup>99</sup> Hamy, *Les origines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p. 256.

<sup>100</sup> 同前書，頁229-248。

<sup>101</sup> Frese, *Anthropology and the Public*, p. 41.

<sup>102</sup> Jomard 與 von Siebold 的分類表，請參考附錄一、二。

<sup>103</sup> Frese, *Anthropology and the Public*, pp. 43-51; 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p. 139-143.

<sup>104</sup> 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p. 151-162.

質到異質依次排列。這種作法所隱含的想法是認為器物製作技術高下可以反映文明進程，帶有演化論的觀點。Pitt Rivers 可說是其中代表人物。在他思考以火器為基礎的系列收藏陳列時，就是希望能夠展現一種技術的進化觀，藉以說明人類文明到達某一發展階段時一定會出現的某種模式，以證明人類心理的統一性 (unity)。<sup>105</sup>

另一種方式是依照地域先作區分，在每個地域展示區內，或依照不同形制的器物分別陳設，或依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工具來分別陳設。譬如食、衣、住、行、戰爭、娛樂等等分項陳列，有同一地區不同民族的同類食器集合比較的呈現，也可以有同一民族烹食時使用的所有器具的陳列。這種先以地域來劃分，再進行比較研究的方式在十九世紀末德、奧傳播論學派出現之後尤其盛行。事實上，這派論者所發展的文化圈理論，一開始便是依賴對博物館系列收藏的研究來發展他們的理論，而不是田野工作的觀察。<sup>106</sup> 不過，也是在同時期，一種試圖將器物加以文化脈絡化的作法也慢慢出現。Hamy 在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的副手 Armand Landrin 在一八八〇年代末期的文章中已經主張這種作法。<sup>107</sup> 同時期美國人類學博物館界，Mason 和 Frantz Boas 的爭論中，Boas 也主張這類陳列方式。<sup>108</sup> 依照 Boas 的理想，物件的展示應該盡可能依情境陳設，將該器物在當地社會和文化環境中被實際使用的情境展示出來，配以寫實的布景和人偶來表現。例如，在呈現衣的情形上，通常會有典型男、女、孩童裝扮的呈現，配以織布、製衣的原料和工具的展示，乃至於織布的過程和技術說明。藉著這種強調整體、脈絡的作法，Boas 所著重的似乎是「過程」，也就是器物製作、使用，乃至於流傳的過程。<sup>109</sup> 這樣的陳列方式所要求的是器物採集者（也就是人類學

<sup>105</sup> 細節的分析請參看 Chapman, "Arranging Ethnology."

<sup>106</sup> Frese, *Anthropology and the Public*, pp. 57-62.

<sup>107</sup> Armand Landrin, "Les musées d'ethnographie, l'ethnographie française," *Revue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3.5(1888): 241-246.

<sup>108</sup> Ira Jacknis, "Franz Boas and Exhibits," in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pp. 75-111; "The Ethnographic Object and the Object of Ethnology in the Early Career of Franz Boas," in *Volksgeist as Method and Ethic: Essays on Boasian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ed. George W. Stocking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pp. 185-214.

<sup>109</sup> Jacknis, "The Ethnographic Object and the Object of Ethnology in the Early Career of Franz Boas," p. 202.



家），能夠對這些器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加以完整的瞭解，需要人類學家在田野工作駐留的時間較長，調查的功夫較深，不只是大量蒐購器物而已。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Boas 也瞭解博物館展示的侷限性。由於 Boas 的作法在呈現上往往需要表現出器物的使用者或工具的操作者，也就是需要有真人的示範表演。這點在實際執行上是有困難的。儘管用人偶取代，最終仍有其不足之處。

一九三〇年代法國人類學博物館裏，Rivet 和 Rivière 的分類觀念基本上是承襲前人的經驗再加以變化。根據他們自己的說明，在常設展的部份基本上採取以地理分區的方式，另外配合數個專供比較研究的陳列室。此外，他們也參照當時逐漸形成的博物館學社群之倡議，規劃雙重博物館 (double musée) 的作法。<sup>110</sup>亦即，在公開給一般大眾參觀的展區，以地理分區的動線安排，並選取最具代表性的物件來展示；在專家學者可以進入的庫房部份，則是採取同類物件系列排放的方式，方便學者做比較研究。<sup>111</sup>

在展示的觀念上，他們則有不同於以往的作法。根據一位當時經常參與佈展的學生 Anatole Lewitzky 的描述，<sup>112</sup> 他們採取了幾個簡單的原則，並且放棄了當時還流行的幾種陳列方式。例如，他們意識到過度寫實會帶來的困境，因此幾乎不再用自十九世紀就開始流行的人偶展示方式。對於物件的陳列，他們的首要原則是力求給每個展件一個適當比例的空間，配以說明，不再像以往將展場當庫房，而展品佔滿展櫃所有空間的作法。也是基於這個凸顯物件本身特性的原則，陳列櫃內不用壁毯或大幅圖樣作底，改用素色中性的底面，好讓參觀者得以清楚觀賞個別物件。另外，他們盡量以水平或垂直等規律的陳列方式，不再像以往有如炫示武器般將物件排列成扇形、圓形或放射狀，將物件當裝飾品的作法。最後，他們善加利用某些展示櫃的深度來增加陳列方式的活潑性，以透明的尼龍線將某些原本就適合懸空呈現的物件如捕魚網等等掛著展示。除此之外，說明物件用途和製作方式的說明板和圖解、照片等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展件。而且在館長和副館長的要求下，這類說明佔據愈來愈多的空間。凡此均表現出他們凸顯這些物件科學性的意圖。在這些展示的改良技術中，靈活運用一九三〇年代後期才問世

<sup>110</sup> 請參看一九二七年創立的國際博物館學專門期刊 *Museion* 上陸續刊登的文章之討論。

<sup>111</sup> Rivière,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 56.

<sup>112</sup> Anatole Lewitzky, "Quelqu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xposition des objets ethnographiques," *Museion* 29.1(1935): 253-258.

的透明尼龍線更在 Rivière 後來陸續發展出的展示技巧上扮演重要的角色。<sup>113</sup> 他利用懸掛的衣物與不同的打光配合後，來呈現出人與使用的器物之間一種暗示的動態感；這是以往的人偶展示無法比擬的。總之，在 Rivière 強調某種展示的美學和秩序的要求下，加上懂得靈活運用博物館不同的空間來增加特展的機會，使得此時期的博物館展覽備受觀眾的肯定。

## 六、博物館—實驗室

根據 Rivière 的說法，「博物館—實驗室」這個觀念源自國立自然史博物館。<sup>114</sup> 不過，在他們一九三〇年代發表的文字裏，卻未見到他們具體說明這個觀念的內涵。反倒是在二次大戰後，在 Rivière 傳授博物館學的備課筆記中，以及與他在博物館工作上有長期合作經驗之晚輩學者的文章中，<sup>115</sup> 可以見到對這一觀念較具體的說明。

從十九世紀有專屬人類學博物館的提議開始，人類學博物館就被定義為科學博物館，而不是美術館；博物館的系列收藏因此與研究工作息息相關。一般博物館內進行的基礎研究工作，其實是將來源不同、性質各異的物件整理成一個一個具有相同基本規格的科學物件，就是記錄、編碼、分類的工作。依照當時及後來的工作指南所示，<sup>116</sup> 爲了有效管理，每個物件應該至少有兩個表格需要填寫。一是收入館藏時要填寫的表格，大致包括收入序號、收入日期、原來號、藏品名稱、數量、藏品簡單描述、來源人、何種管道入藏、價值或代價、來源地、收藏者或製造者、收集日期等項目。另外則是編目表格，包括目錄號、收入號、原來

<sup>113</sup> Gorgus, *Le magicien des vitrines*, pp. 180-183.

<sup>114</sup>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p. 63. 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的每個教席都有一個專屬的實驗室（研究室），因此人類學教席也有一個人類學實驗室（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由於 Rivet 擔任館長之後就將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歸為自然史博物館人類學教席的負責範圍，在民族誌博物館進行更新工程之初，原本博物館的許多功能都暫時由人類學實驗室代理（參見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是否因此產生這樣的想法和口號，不得而知。

<sup>115</sup>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Isac Chiva, "Le musée-laboratoire, service public de recherche," *Ethnologie française* 17.1(1987): 61-63.

<sup>116</sup> *Instructions sommaires pour les collecteurs d'objets ethnographiques* (Paris: Musée d'ethnographie et mission scientifique Dakar-Djibouti, 1931); Yvonne Oddon, "Instruments documentaires," in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pp. 195-203.

號、數量、藏品名、質料、藏品描寫、狀況、年代、所由來地、收集者或製造者、收集日期、何種管道入藏、價值或代價、照片號、拓片號、圖號、有關文件號、所在地等項目。如此詳細登錄的目的在於讓研究者能夠充份掌握每個物件的名稱、來源、出產地、出產時、材質、用途、製作者、製作過程、使用場合、所有人身分、使用者身分等等背景資訊。此外，Rivet 當時還要求將相關物件的線描圖或相片附在編目卡片背後，讓研究者在接觸物件之前就有文字影像的相關資料。<sup>117</sup>

由於人類學物件之科學性內涵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比前一個世紀又豐富許多，尤其是在研究上要求脈絡化、整體化的驅使下，所謂人類學物件的涵蓋範圍其實已經不只是傳統的器物而已。舉凡田野筆記、旅程紀錄、照相底片、各類幫助記錄用的線描圖、影音紀錄等等，也都逐漸被視為可以幫助研究的人類學物件，必須做系統的歸檔整理。<sup>118</sup>

人類學物件既被視為是某一社會文化的意義載具，而被當作是人類學這門學問所倚賴的檔案文件，其重要性同時表現在收集和研究兩個階段，也就是說，田野採集調查與在博物館中進行的研究工作應該是有連續性的。<sup>119</sup> 根據 Rivière 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授課筆記中的整理，他認為博物館理想的研究步驟大致如下。首先是篩選問題，也就是說，在重新審度、檢討現有理論以及對研究領域現狀的不足之處有所評估後，釐清進一步要解決的問題。其次是根據所選擇的問題方向來蒐集材料。第三步是依據通行的詞彙和方法，對這些蒐集到的材料進行有系統的分類和詳細的描述。第四步是對這些材料做分析，包括對一件材料本身構成元素之間的結構關係作分析、對其材質進行化學分析和辨識，以及建立一群同類材料之間互相關聯性的分析和統計。第五步則是做綜合整理和初步理論的提出，也就是研究的結論。這些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後，接下來就是成果的公開展示、書寫發表。最後一步乃是對公開展示和論文發表所得到迴響的整理和評估，為下一個研究做準備。<sup>120</sup>

從這個流程概述，我們可以歸納得知，博物館的研究是隨著人類學這個學問發展的需求進行的，田野工作的目標又是隨著博物館的研究中發現的不足或成果

<sup>117</sup> Rivet and Rivière, "La réorganisatio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 7.

<sup>118</sup> Chiva, "Le musée-laboratoire, service public de recherche."

<sup>119</sup> 同前文。

<sup>120</sup>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p. 172.

來做調整。田野採集回來的物件、相關解釋訊息，在博物館經過系統整理分析後所得結論，又需要田野工作者下一次到田野時實地驗證理論的有效性和普遍性。兩方面的工作因此應該是循環互動的。一九三〇年代，田野工作的規劃和實踐者的經驗不多，許多在田野工作實際進行中會遭遇到的問題並未被意識到。因此田野工作被認為應該做單純的觀察、記錄、採集，而不牽涉到比較、分析、詮釋的部份。後面這些部份的工作一般被認為應該是在博物館內進行的。博物館在系列收藏物件的基礎上所進行的研究因此有一定的實驗性質，需要與田野所觀察到的現象實況相互印證。因為任何新發現的物件或新觀察到的現象加入，都有可能推翻或改變原本建立的假設系統。陳列展示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展示內容事實上同時包括了收集到的材料、使用的分析方法和得到的結論，目的是讓不能親自到某個田野觀察收集，或不能親自處理這些材料的研究者，都可以來觀看、提出意見，乃至於與其專長領域作比較研究，最後歸納出某些通則。<sup>121</sup> 展示因此具有示範說明，甚至推演某一個理論的性質。古語文學訓練背景出身而對口述的可靠性有所保留的 Mauss，並沒有加入當時演化論和傳播論之間的論戰，不過他卻非常注意文化圈概念的討論。在一系列為了討論文明概念作準備的文章裏，他就提到「看」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參觀博物館的經驗：

以我個人而言，我沒見過比牛津大學博物館人類學部門更有啟發性的機構，那是 Tylor 和 Balfour 的傑作。我們在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類如何掙脫動物的外殼，如何邏輯地、按照時間次序地發展出技術和藝術。其他的博物館應該都是、或將來都是如此地對眼睛和頭腦「說話」。<sup>122</sup>

從這些說明可以看出，一九三〇年代的人類學博物館已經從被動地接收贈品，逐漸轉向主動地鼓勵或組織可到田野調查的人或團體，去蒐集博物館中的人類學研究所需要、但仍欠缺的物件。<sup>123</sup> 不過，這類行動的前提是，博物館對現有的藏品都經過清點整理、辨識研究，並且在比對、釐清關聯性後，得知現階段研究中尚須補充之處。理想上是如此，不過，一九三〇年代的實際情況是，前人留下的收藏太多，而之前投入的人力不足以應付。因此年輕學生必須做的工作就是逐一重新清點、辨識、記錄和歸檔。另外，當時認定要補充的方向，似乎是以

<sup>121</sup>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 516.

<sup>122</sup> Marcel Mauss, "La théorie de la culture selon Wissler," in Mauss, *Œuvres*, vol. 2, p. 509. 文中加底線者乃依照原作者標示之黑體字。

<sup>123</sup>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p. 172.

地域來考量，鼓勵田野工作者或捐贈者前往博物館需要補充相關藏品的地區。由於該博物館藏有大量的美洲藏品，因此當時鎖定的是所謂「黑色非洲」之藏品。這也是為什麼當時遠征的目的地常常是非洲大陸。這也與當時法國殖民的發展重點正好相配合。

在瞭解 Rivière 和其學生相關的概念闡述之後，我們有必要對於現代實驗室在科學知識生產中的地位做進一步的分析，以探知這個看似不經意形成的口號和看似瑣碎的操作動作背後可能蘊含的意義。而這意義可能是當時操作者本身無意識的一種信仰，也可能是他們有意識地創造出來的。

根據科學史學者的研究，現代形象的實驗室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才逐漸確立其必要性地位。<sup>124</sup> 與十七、十八世紀就零星存在的私人工作坊相較，現代實驗室在內涵與規模上有極大的變革。在實驗室成為科學生產必經的場所之前，博物館、醫院、植物園、天文觀測臺事實上已經扮演了類似的角色。透過資金與人力的集結，學者在這些地方匯集、整理、陳列和鑑別各類資料，包括人類、器官、器物、影像、測量數據等等。所有對於自然界的認識都是來自於對這些系列收藏的分析，前提條件是要對收集到的標本先進行辨別和分類。相較於這些機構，較晚確立其地位的實驗室也具有這些特性。所不同的是，在工業革命時代出現的現代實驗室由於動用的資料、儀器設備、工作人員的規模之大，特別需要能夠配合其工作流程的理性空間規劃。這樣的空間還必須盡量做到能夠隔絕外界自然因素干擾、進行嚴格控制變因的實驗，以求成果的精確度臻於極致。不過，就像是上述幾個科學操作的場所，實驗室其實並非完全與世隔絕，而是具有既隔絕又公開的性質——其中的實驗性工作往往不是關起門來做，而是在公開的示範和說明會中進行的。<sup>125</sup> 因為一個堅實可靠的科學知識往往不是一個人關起門來進行的，它需要不同人力的參與、器材設備、大量標本、各類工具，所以是一個動員人與物的團隊工作。同時工作人員必須要公開發表其研究成果和所使用的研究技術，好讓其他人能夠反覆檢查、驗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完全開放、毫無限制

<sup>124</sup> 例如 Simon Schaffer, "Un monde apprivoisé," *Les Cahiers de science & vie* 51(1999): 6-15; W. F. Bynum, *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92-117; John V. Pickstone, "Museological Science? The Place of the Analytical/Comparative in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History of Science* 32(1994): 111-138.

<sup>125</sup> Schaffer, "Un monde apprivoisé," p. 8.



的實驗室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實上，只有那些經過一定程度的知識和操作訓練的人員才能在其中有效地工作，獲得可用的結果。

從科學與社會互動的角度來看，這些機構也是一個各種人員、物質頻繁流動網絡的中心點。正如 Bruno Latour 在其科學操作分析著作中所提出的計算中心 (center of calculation) 概念，<sup>126</sup> 這些機構都是提供分類原則、測量標準和校準根據，成為一個整合資訊、產生科學知識和科學標準的地方。對於人們無法解釋的自然界現象、社會中無法解決的問題和需求，這類計算中心（實驗室、博物館）透過一套可將材料和問題分解轉化成可操作、校正、整理和規範的訊息分析系統，以提供可能的解決之道。

有趣的是，這樣一個集中的、龐大的、將問題轉換成答案的機構和機制，也同時具有轉換其內部元素的能力。進入的原本是實習助手、龐雜標本和原始材料，經過實驗室的長期工作規訓後，出來的變成是專家、系列資料和一套理論或發明。<sup>127</sup> 就人員的這個層次而言，實驗室同時具有觀念教導、實習訓練和身心規範的功能，使得生手在其中可以蛻變成專家。不過，不論是提供標準、得出成果或是訓練專門人員，這些都需要長時間、有系統地建制化過程才可能獲得結果。畢竟學徒不是一天就可以變師傅，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也不是一天就可以達到的。

回到人類博物館當時的情況來看，在「田野」工作尚未變成判定專業人類學家的標準和職業認同的象徵標誌之前，一九三〇年代的學生主要是在博物館工作裏學習和實踐其專業知識。在某種程度上，博物館可以說就是他們的田野。他們要在其中學會如何分類、編目、清潔、修復、收藏和陳列。學員在未去田野之前就可以在裡頭學習認識許多部落的器物、試著研究同一個文化圈裏同類器物製作之間的關聯性，或研究其演變、或做比較研究。所以在當時訓練出來的學生，在兩份論文中，多會有一份論文以物質文化為題目。例如 Alfred Métraux 以美洲 Tupi-Guarani 部落的物質文明為題，<sup>128</sup> Soustelle 研究的是美洲 Lacand 地區印

<sup>126</sup> Bruno Latour,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15-257. 國內有關 Latour 此概念的介紹，可參見李尚仁，〈收藏的帝國：博物館作為科學研究機構的歷史〉，《博物館學季刊》17.2(2003)：37-43。

<sup>127</sup> Schaffer, "Un monde apprivoisé," p. 9.

<sup>128</sup> Alfred Métraux, *La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des tribus tupi-guarani*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28).

地安人的物質文化。<sup>129</sup> 另外，Leroi-Gourhan 在戰時出版的兩冊有關演化與技術的書，則是從技術與物質的運用來談人類文明的變化。<sup>130</sup> 這些著作也都成為他們的成名作。

綜合言之，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受到自然史和史前考古學蓬勃發展的影響，對於廣義人類學有興趣的學者體認到「文化物質性」(matérialité de la culture)的重要和可入手性，<sup>131</sup> 由此開始注重器物的蒐集、保存和研究。對於這些學者而言，人類學物件被視為是一種證物，一種證據，又像史料一樣，透過對它們的研究可以瞭解某一地區人民所曾經歷過的生活、技術、經濟型態，乃至於宗教或道德觀念，簡言之，也就是他們曾經發展出的文明。藉著比較世界人類歷史中曾經留下痕跡的各種文明之間的異同，研究者希望能釐清其間的關聯性，從而整理出某些通則。即使不能對文明的起源做出明確結論，也希望能夠瞭解其形成的過程、存在的型態，以及各文明之間交流的狀況。<sup>132</sup> 爲了反對奇珍室的作風，也爲了補正過去異國遊記傳聞中資訊謬誤缺漏的現象，十九世紀的學者在物件身上看到建立一個實證科學的可能性，這樣的想法一直到二十世紀上半葉都還有相當的影響力。就像 Rivet 等人認為，器物不會撒謊也不會欺騙 (ni mentir ni tromper)，比文字和口傳可靠。<sup>133</sup> 爲了凸顯這些物件在實證科學研究上的意義，歷來的學者皆強調系列收藏和理性陳列的重要性，並且表現出反美感、反稀有性的傾向。對他們來說，單一物件本身的美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原本社會脈絡中的功能，或在系列收藏比較中所能提供的訊息。這種建立實證科學的企圖到了一九三〇年代的人類學博物館，不僅表現在器物的蒐集、保存上，甚至表現在理性的空間規劃、搭配大量說明的展示手法上，在在都爲了建立人類學是一種「硬科學」(science dure / hard science) 的形象，擺脫博物館過往奇珍室的傳統。不過，這種希望透過不斷累積的物件系列研究來瞭解文化整體面貌的想法，本身

<sup>129</sup> Jacques Soustelle, *La culture matérielle des Indiens lacandons* (Paris: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1937).

<sup>130</sup> André Leroi-Gourhan, *Évolution et techniques*, vol. 1, *L'Homme et la matière*; vol. 2, *Milieu et techniques* (Paris: Albin Michel, 1943-1945).

<sup>131</sup> Alain Schnapp, "Archéologie," in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d. André Burguière (Paris: PUF, 1986), pp. 60-67; Annette Laming-Empeaire, *Origines de l'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en France* (Paris: Picard, 1964), pp. 187-193.

<sup>132</sup> Rivet, "L'étude des civilisations matérielles."

<sup>133</sup> Jamin, "Préface," p. xix.

可能因為求全的心態而不易達成目標，也因為經驗論 (empirisme) 的作法以致容易停留在註解物件的層次上，難以在理論層次上有所突破。這也是後人在回顧博物館時期的知名學者包括 Boas、Mauss 等人的學術成就時，常會指出的侷限之處。<sup>134</sup>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也許沒有提出驚人的理論，卻為人類學的建制化打下堅實的基礎。使得後來從事此業的學者即使不必再依賴這種實證的手法，也不必擔心學科的科學性或專業性受到質疑。

## 七、參與者的回憶

在人類學從邊緣、廣泛的學問逐漸在學院裏有了一席之地之蛻變過程中，不管是實際參與者自身或外界社會對他們的認定，都還很浮動。有人自比為探險家，也有人自況為專業的旅行家。<sup>135</sup> 其他職業的人，譬如殖民官員，也可以說自己是人類學家，最後實際轉行的情況也的確存在。<sup>136</sup> 所以，所謂的「專業」(profession) 概念在當時人類學界仍不明確。但是，無論如何，學員們很清楚自己進入一個行業 (métier)，有其特殊的技術要求和規範。現今被人類學學術社群認定為職業標誌的「田野」工作，也在這個漫長曲折的演變過程中，逐漸從單純博物館工作的延伸，變成從學徒成為師傅的決定性「過渡儀式」(rite de passage)。<sup>137</sup>

這個時期的參與者，不管是學員或老師，彼此都建立起某種草創時期的同志情感。一九二〇、三〇年代，托卡德侯民族誌博物館所集結的這個學派，由於得

<sup>134</sup> 有關 Boas 的研究，數量眾多，又以 Stocking 的著作最具代表性，於此不一一列舉。中文讀者可先參考林開世，〈文化人類學之父：鮑亞士〉，收入黃應貴編，《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臺北：正中書局，1992），頁2-51。至於 Mauss 研究的情形，可參考 Fournier, *Marcel Mauss* 一書中導言部份。

<sup>135</sup> 例如 Griaule 為知名的法國小百科叢書系列“Que sais-je?” 撰寫一本《大探險家》(*Les grands explorateurs*, Paris: PUF, 1945)，就把民族學中心在一九三〇年所發起的田野調查工作歸在其中。André Leroi-Gourhan 也曾主編過類似的書，《知名探險家》(*Les explorateurs célèbres*, Genève: Mazenod, 1947)。

<sup>136</sup> 例如戰後先後成為里昂大學和尼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的 Jean Poirier，和長期負責法國的非洲研究主要刊物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的 Pierre Alexandre，都屬於此種經歷的人類學家。

<sup>137</sup> Georges Condominas, “Ethnics and Comfort: An Ethnographer's View of His Profess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72, p. 2.

到官方的倚重，其影響力逐漸擴大。儘管如此，以真正長期投入的核心份子之數量來看，人數其實不多。除了前面提過的幾位主事者和教師之外，主力學生人數不超過三十人。<sup>138</sup> 在一九二八到三二年之間的第一個博物館重整階段，往往是由主力學生負責一個地理區域的文物，帶領志工（許多是教授們的親友和居住在十六區的居民）<sup>139</sup> 投入清潔、歸類、抄寫卡片等等耗時費神的工作。

由於當時學院裏沒有人類學系，第一代的學生來源背景多元，有哲學或法律訓練背景的學生、軍人、古語言的愛好者，也有專職的音樂家。<sup>140</sup> 或者是慕某位老師之名而來、或者是喜愛原始藝術和爵士樂、或者是因為得到老師的倚重，糊里糊塗接下了博物館的整理工作，一頭栽進了滿是灰塵的雜物堆後，從此走向了不歸路。Soustelle 的例子就屬於最後這種情形。十七歲以第一名的成績進入高等師範學院 (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就讀，二十歲又以優異成績取得教師會考哲學科的榜首，卻因為無意中上了 Rivet 的課，帶著好奇的心情加入博物館的文物整理工作，負責清點美洲印地安文物，從此和馬雅、阿茲特克文明結下不解之緣。在經歷了南美洲的田野工作、二次大戰海外抗德行動後，卻因為反對法屬阿爾及利亞獨立而流亡，在晚年進入法蘭西學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的 Soustelle 回憶起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法國人類學景況，認為它就像是那個「還沒有任何好心的仙女送她金馬車的灰姑娘」(la Cendrillon que nulle bonne fée n'a encore dotée de son carrosse)，等待著奇蹟發生，讓世人真正瞭解她的美德和價值。而他們做的工作就是希望這個奇蹟早點到來。<sup>141</sup>

<sup>138</sup> André Leroi-Gourhan, "Qu'est-ce que c'est ... l'ethnologie?" *Bulletin du Centre de formation aux recherches ethnologiques* 5(1953): 1-5.

<sup>139</sup> 根據館長等人的估算，慣常在博物館出入幫忙的志工大約五十多人。見 Rivet, Lester and Rivière,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p. 521. 根據幾位學員的回憶，當時工作間裡經常可見「磨練中或經驗老到的學者、前衛人士、上流社會名媛擦肩而過」。見 Solange de Ganay et al., eds., *Ethnologique: hommage à Marcel Griaule* (Paris: Hermann, 1987), p. x.

<sup>140</sup> 例如 Denise Paulme 原來是法律系畢業，Paul Rivet 和 Marcel Griaule 原本都是軍校出身，Georges Henri Rivière 與館內後來負責民族音樂部門的 André Schaeffner 都有專業的古典音樂背景。另外，許多學生都同時在高等實踐研究院或東方語言學院修課，例如 André Leroi-Gourhan 與後來專門研究越南的 Paul Mus 都修習過多種東方語言。

<sup>141</sup> Jacques Soustelle, *Les Quatre Soleils, souvenirs et réflexions d'un ethnologue en Mexique* (Paris: Plon, 1967), p. 26.

大部份這個時期的學生在晚年的回憶裏，都提到清點自一八七八年以來就沒有動過的藏品，開箱、封箱、清潔、修復、編號、填寫卡片、打字編目的工作。在第二次大戰後整理 Mauss 上課筆記並以 Mauss 掛名出版了《民族誌手冊》(*Manuel d'ethnographie*) 的 Denise Paulme (1909-1998)，就敘述了自己如何從連 Mauss 的名字都沒聽過，到愛上博物館工作，再到非洲進行田野調查，最後成為專業人類學家的歷程。<sup>142</sup> 另外也有學生記得的是博物館生活的一面。知名的人類學家兼考古學家 Leroi-Gourhan 回憶起他當時因為學過俄文，又偏好北方民族研究，被賦予整理有關北極圈居民文物的任務，一天中不管幾點，即使是凌晨三點，也可以到館內清理那些塵封多時的藏品的情形。他也還記得，在一次有關撒哈拉沙漠的大型展覽籌備時，他和另一位同伴負責開幕時的演出，也就是喬裝成當地游牧民族 Touareg，拿著馬刀和盾牌，扮演一場兩人決鬥的異國情調場景。<sup>143</sup>

相對於博物館和文物研究的工作，有些學生則是傾心於當時正積極展開的遠征任務。不過，因為當時交通不易、經費不足，所有遠行採集的機會，都是透過博物館爭取而來，相關的準備工作也以博物館為基地。遠征採集的目標也是為了彌補博物館在某些地區的藏品及研究之不足。從空軍軍官職務退役轉而投入人類學、並且因為其組織遠征能力受到肯定而成為著名領隊的 Marcel Griaule 非常清楚這一點。在描述某次非洲任務的文字中，他如此寫到：

空中的數度繞行讓我們拍下了查德南部的景象。在地面上，其他的調查也還繼續著。幾年下來收集到的數千份資料已經讓我們得以開始對 Saô 提出問題，並且規劃往後幾年的研究。有了這些資料，我們將可以組織專門研究這個消失文明的遠征工作。

這是我們好幾年來的企圖。在這輛載著我們快速駛向南方的卡車裡，我們心滿意足地想著那些將要堆放到托卡德侯博物館地下室的大木箱。

因為，在這樣的研究裡，所有的一切最後都要放到大木箱裡。<sup>144</sup>

可見當時在博物館的實作上，逐漸標準化的工作流程在師生之間漸漸形成並且被普遍接受。其影響之深，往往是遵守規範者不自知，但不自覺地逾越規範者可能終生難忘的。Michel Leiris 本身就為後者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在著名的

<sup>142</sup> Denise Paulme, "Quelques souvenirs,"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19(1979): 9-17.

<sup>143</sup> André Leroi-Gourhan, *Les racines du monde* (Paris: Belfond, 1982), pp. 142-145.

<sup>144</sup> Marcel Griaule, *Les Saô legendaires* (Paris: Gallimard, 1943), p. 134.



「達卡—吉布第任務」中負責文書和記錄工作的 Leiris，同時也記錄個人在旅程中所思所見的一切。這部私人日記在一九三四年出版時，由於與一般要求的專題研究文章的格式相去甚遠，並且不乏對這類採集任務和殖民地環境的質疑，在當時小小的人類學社群中，引起不少議論。他的老師 Mauss 和 Rivet 雖然並未明白譴責，卻不十分同意 Leiris 出版旅程日記的行爲。在那段時期中，Leiris 甚至好幾次夢到 Rivet 對這本書的反應。<sup>145</sup> 在現實生活中，他也因爲 Griaule 對他的不諒解而與之漸行漸遠，從此沒有再參加 Griaule 所領導的田野工作團隊。

事實上，這個時期草創者之間的稠密情感，往往是後來加入的成員無法想像，當事人本身也未必明白的。從一個有關 Mauss 的軼聞中多少可以看出這個現象。Mauss 的講課以天馬行空著名：他晚年時，Paulme 等幾位學生希望整理他的上課內容，以他的名義出版成書，幾個長期跟課的學生互相比對筆記後，發現每個人記錄的重點都不一樣。而且他的講話也常常延續到下課後，學生陪他一邊走路回家一邊繼續話題。晚年的 Mauss 因爲受到第二次大戰的打擊和自然老化的影響，出現記憶退化的情形，有時不認得原來相識的人。當 Lévi-Strauss 去探望他時，Mauss 把他當成同樣也是研究美洲印地安文化的 Soustelle，Louis Dumont 則被 Mauss 當成是 Leiris。<sup>146</sup> Soustelle 和 Leiris 事實上都是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就與 Mauss 結下師生之緣，並且在博物館工作中投入許多時間的第一代專業人類學家。

對於新進人員而言，這個時期的人類學博物館其實提供了一個教、考、用（接受教育訓練、博物館和田野的考驗、博物館內專職的研究工作）都可以在其中完成的完整環境。從一開始與器物的接觸，逐漸熟悉各地文物，到選擇田野、田野工作的安排、經費的來源、團隊的組成、訂定田野工作的目標，莫不是在博物館的環境中進行。從田野工作回來後，爲自己與團隊所收集到的器物分類、填寫卡片、建立清冊，到展覽的安排、展覽特刊的撰寫、器物與相關社會文化研究的文章發表……皆是可以預見的過程和目標。當時主要的學會會址就在博物館內，學會的期刊是可供發表的現成園地。每次的展覽都是這個小小的學術社群交流討論的機會，同時也是這些研究者和相關領域的同好聚會社交的場合。也因爲

<sup>145</sup> Jean Jamin, "Présentation de l'Afrique fantôme," in *Miroir de l'Afrique*, by Michel Leiris (Paris: Gallimard, 1996), p. 71.

<sup>146</sup> Fournier, *Marcel Mauss*, p. 758.

需要輪流負起導覽的工作，博物館的展覽更是他們直接與大眾接觸的機會。簡單地說，在一九二〇年代就進入博物館學習的這一代，一輩子的職業和志業都可以在當時博物館的環境中得到實現和滿足。這種比較接近舊時手工業學徒制的環境和氛圍是後來的學院所沒有的，尤其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人口暴增的大學裏找不到的。事實上，因為資源集中、人才尚稀，人類博物館給予內部培訓的人才一個穩定且良好的回饋。當時畢業後繼續留在博物館內工作的學生比例相當高，他們也很快地被賦予重任。

從學習到展出，從其他研究者參觀後的問題和迴響，再回到策展人自己對所接觸過的社會文化所做的思考，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循環。而這樣的循環往往是圍繞著實物和實作進行的。這樣的環境，在當時注重形而上理論教育的大學內並不常有。這是博物館人類學的特色，也成了它可能的限制。

## 八、結語

一九四〇年七月，第三共和被迫結束，法國政府由願意與納粹合作的貝當元帥掌權，首都設在維琪 (Vichy)，成立了維琪政制 (régime de Vichy)。同年十一月，Rivet 從廣播中得知他被維琪政府除去博物館館長職位，遺缺由體質人類學家 Henri Vallois 遞補。<sup>147</sup> 同時，在巴黎大學民族學中心，Mauss 和 Rivet 原來的秘書職位也被 Marcel Griaule 和 Paul Lester 所取代。<sup>148</sup>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 Griaule 的建議和規劃下，教育部決定在巴黎大學正式設立人類學教席。<sup>149</sup> 這個教席成為法國大學系統內第一個人類學教席。由於戰後這個教席並沒有因為是在非常時期設置而被取消，加上一九四四年里昂大學、一九五三年波爾多大學也跟進，陸續設置了人類學教席，人類學從此在大學內生根。一九四四年六月，聯軍在諾曼地登陸成功，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抗德部隊在聯軍的支援下一步步從納粹手中收復法國領土。維琪政府也在八月隨之瓦解。同年十月，Mauss 和 Rivet 等人恢復原職，卻因為年齡和健康的關係逐漸進入退休狀態，民族學中心奠基三人組中最資深的 Lévy-Bruhl 也早在一九三九年戰事爆發前過世，該中心從此由戰前訓練出的學生輩負責。在人類博物館的部份，Rivière 因為在戰爭期間受到

<sup>147</sup> Laurière, "Paul Rivet," p. 122.

<sup>148</sup> 見民族學中心行政委員會會議紀錄：Procès-verbaux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1940.

<sup>149</sup> 見法國國家檔案館資料，編號 F17 13358,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42-1943."

維琪政府任用而遭受調查，一時無法回復原職。<sup>150</sup> 畢業的學生中，Leroi-Gourhan 成為副館長，Leiris 和 Paulme 繼續主持非洲部門，André Schaeffner 負責民族音樂部門，試著延續始於戰前的工作。在戰前原本已經接任副館長職務的 Soustelle 因為參加海外抗德行動受到戴高樂的重用，戰後初期有大半時間貢獻於政治事務，因此暫時脫離博物館工作。

表面上，人類博物館的工作仍然延續，但是由於新機構的陸續成立，博物館在整個法國人類學領域的角色有相對的改變。在教學方面，大學系統開始接納人類學，擔負起教學功能。在研究方面，除了原先存在的學會組織和博物館，籌備多年但在戰後才正式運作的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CNRS)，也開始扮演起專門研究機構的角色。<sup>151</sup> 該研究中心的人文科學部門下總共包含六個組，其中人類學組涵蓋了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和史前研究，Rivet、Vallois、Henri Breuil 神父、Maurice Leenhardt、Soustelle、Schaeffner 和殖民官兼人類學家 Robert Delavignette 等人都是主持委員會中的委員。<sup>152</sup> 雖然初期這個研究中心只是扮演分發研究獎助金的角色，但是其實質的研究功能在一九五〇年代逐漸明確化。人類學研究的統籌工作從此漸漸從博物館轉移到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由以上的變化可以看出，第二次大戰後，人類博物館原本在法國人類學界的特殊地位逐漸消失。一方面，大學在一九五〇年代成為教育新一代人才的場所；另一方面，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內所設的人類學組又分割了其研究功能。雖然初期仍是原來在博物館培養出的這一代學生在不同機構兼任，但是博物館原有的各種功能齊聚一身的特徵不再，也不再是專業人類學家的唯一訓練場所。此外，由於法國殖民帝國的瓦解、殖民地解放運動在國內引起的爭論等等因素，曾經與開明派殖民官員攜手合作，企圖建立一個文明的、人道的殖民面貌的人類博物館，當然也無法繼續擔負這樣的任務。事實上，因為知識份子對殖民主義的批判，使得實用人類學和倚賴殖民地材料的人類學博物館之發展陷入困境，同時理論性格濃厚、似乎不需倚賴太多田野材料的結構人類學出現，巧妙地取代了舊的典範，轉

<sup>150</sup> Christian Faure, *Le projet culturel de Vichy*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89).

<sup>151</sup> 關於此研究中心大致的介紹，可參考 Jean-François Picard, *La république des savants: la recherche française et le CNRS* (Paris: Flammarion, 1990).

<sup>152</sup> Gérald Gaillard, "Chronique de la recherche ethnologique dans son rapport a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ahiers pour l'histoire du CNRS, 1939-1989* 3(1989): 85-126.

移了發展重心，開啓了法國人類學以理論見長的時代。在此時空背景下，人類博物館因為被視爲是「殖民人類學」時代的產物，在未審先判的情況下，一下子被打入歷史的黑牢，它在該學科發展過程中的功過得失也因此失去了被客觀檢討的機會。

事實上，從法國人類博物館的例子來看，在人類學從一個主題廣泛、範圍模糊的學問，逐漸轉變成大學內知識內涵清楚、界線確定之獨立學科的漫長建制化過程中，博物館提供了一個相對獨立的工作環境，有其標準的工作流程、相對客觀的考覈程序，以及人事上的任用權，是對此學科有興趣的學子可以在其中求取知識的場所。當時的人類博物館不僅是一個基本研究材料匯集和整理的地方，知識生產和流通的所在，也是人才養成的場所，更是該學科與外界社會接觸的重要櫥窗。由於具有公開展示的特性，它也是一個學者與學者、學者與贊助者、學者與大眾之間，乃至於殖民母國與各殖民地相關人士、法國國內與國外相關學者知識與學術交流的中心。對於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從不同行業或學科轉入這個新興學科摸索學習的第一代學生而言，它更是他們職業生涯認同的對象；<sup>153</sup> 也是他們晚年對自己職業生涯回顧時一個共同記憶的所在 (*lieu de mémoire*)。

在人類學尚未取得獨立發展之實質條件以前，我們也觀察到，政治力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當時倡導人類學重要性的學者十分有意識地向政府發聲，最後也是因為政府的決策讓人類學得以進入學院，並且擁有第一座獨立的博物館。也許是所有這些特殊的時空背景和情勢條件，造就了法國人類博物館的輝煌時代。不過，若沒有當時主事者的努力和眼界，把握歷史契機，帶領法國人類學在建制化的過程中走出關鍵性的一步，它也無法從十九世紀末一個邊緣隱晦的學問，變成二十世紀中葉受學界重視、得到一般群眾認識，乃至於吸引更多年輕學生投入的專業學科。新一代的人類學學者可以不必將人類學與物質文化研究掛鉤，而在理論、概念等抽象層次上，與哲學或其他社會科學較量，甚至批評早期的人類學過於侷限。但是如果在建制化過程中沒有經過逐一整理、分析基礎材料的實證階段，今人是否會識得人類學是一門獨立學科？或只是社會學、哲學，甚至神學領域裏的一個討論主題？答案恐怕未必是完全肯定的。

(本文於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過刊登)

<sup>153</sup> 參看 Jean Rouch, "Le renard fou et le maître pâle," in *Système de signes: textes réunis en hommage à Germaine Dieterlen* (Paris: Hermann, 1979), pp. 3-24.

## 後記

本文初稿曾於二〇〇五年三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報告，感謝與會學者提出寶貴意見。二稿完成於二〇〇五年五月，之後承蒙三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和建議，以及李貞德教授的文字修改意見，謹在此向他們致上謝忱。三稿完成於二〇〇六年二月。



## 附錄一

### CLASSIFICATION DE JOMARD (1862)<sup>154</sup>

- |            |     |   |
|------------|-----|---|
| Classe I   | –   | <i>Représentation de la figure humaine.</i>                 |
| Ordre      | 1 – | Les figures entières et les groupes.                        |
|            | 2 – | La Physionomie.   |
| Classe II  | –   | <i>Arts qui servent à procurer la nourriture.</i>           |
| Ordre      | 1 – | L'Agriculture.  |
|            | 2 – | La Chasse.  |
|            | 3 – | La Pêche.   |
| Classe III | –   | <i>Arts qui servent à l'habillement.</i>                    |
| Ordre      | 1 – | Vêtements du corps.   |
|            | 2 – | Coiffures.  |
|            | 3 – | Chaussures.   |
| Classe IV  | –   | <i>Arts qui servent au logement.</i>                        |
| Ordre      | 1 – | Modèles de construction.                                    |
|            | 2 – | Outils et instruments.                                      |
|            | 3 – | Matériaux travaillés (échantillons).                        |
| Classe V   | –   | <i>Économie domestique.</i>                                 |
| Ordre      | 1 – | Meubles de la maison.                                       |
|            | 2 – | Vases.  |
|            | 3 – | Instruments à couper.                                       |
|            | 4 – | Usages divers.  |
|            | 5 – | Objets de luxe.   |
|            | 6 – | Instruments divers.   |
| Classe VI  | –   | <i>Objets propres à la défense de l'homme, à la guerre.</i> |

<sup>154</sup> 出處：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 135. 中譯出自筆者。

Ordre	1 –	Armes défensives.
	2 –	Armes offensives.
	3 –	Insignes à la guerre.
Classe VII	–	<i>Arts, Sciences, Industrie.</i>
Ordre	1 –	Commerce.
	2 –	Comptes et calculs.
	3 –	Écriture.
	4 –	Navigation, sciences, astronomie.
	5 –	Machines.
	6 –	Équitation.
	7 –	Matières préparées pour les arts.
	8 –	Métallurgie.
	9 –	Peinture et dessin.
Classe VIII	–	<i>Musique.</i>
Ordre	1 –	Instruments de percussion.
	2 –	Instruments à vent.
	3 –	Instruments à corde.
	4 –	Chants notés.
Classe IX	–	<i>Usages, mœurs, coutumes, habitudes.</i>
Ordre	1 –	Mariages, noces, funérailles.
	2 –	Enfance, éducation physique.
	3 –	Fêtes et jeux.
	4 –	Usages.
	5 –	Déguisements.
	6 –	Jeux de combinaison.
	7 –	Parures.
Classe X	–	<i>Religions, Culte.</i>
Ordre	1 –	Idoles.
	2 –	Superstitions.
	3 –	Modèles.
Appendice:		figures d'animaux.

Jomard 的分類 (1862)

Classe I		人形人像再現
Ordre	1	全身像和團體
	2	人面像
Classe II		用於取得食物的技藝
Ordre	1	農業
	2	狩獵
	3	漁獵
Classe III		用於衣物的技藝
Ordre	1	身體衣物
	2	頭冠髮飾
	3	鞋類
Classe IV		用於住屋的技藝
Ordre	1	建築類型
	2	工具儀器
	3	材料（樣本）
Classe V		住家治理
Ordre	1	傢俱
	2	容器
	3	切割類器具
	4	各種用途器具
	5	奢侈品
	6	各種用途工具
Classe VI		防衛或戰爭器物
Ordre	1	防衛武器
	2	攻擊武器
	3	有關戰爭的標誌、象徵
Classe VII		工藝、科學、工業
Ordre	1	商業
	2	會計與計算

	3	書寫
	4	航海、科學、天文
	5	機器
	6	馬術
	7	工藝方面使用的材料
	8	冶金鑄造
	9	繪畫與繪圖
Classe VIII		音樂
Ordre	1	打擊樂器
	2	管樂器
	3	弦樂器
	4	歌譜
Classe IX		風俗習慣
Ordre	1	婚喪
	2	育兒、體育
	3	節慶和遊戲
	4	其他習俗用具
	5	喬裝
	6	棋類或牌類遊戲
	7	裝飾配件
Classe X		宗教、信仰崇拜
Ordre	1	偶像
	2	迷信
	3	模型
附加		動物像

## 附錄二

### CLASSIFICATION DE VON SIEBOLD (1837)<sup>155</sup>

Première division.	Collection d'objets scientifiques.
Section	I – <i>Livres imprimés, manuscrits et gravures sur bois.</i>
	II – <i>Dessins et tableaux.</i>
	III – <i>Monnaies et médailles et quelques objets archéologiques.</i>
Deuxième division.	Collection d'objets d'industrie nationale, faite et rangée pour faire connaître l'états des arts et métiers ainsi que les divers ustensiles dans leur rapport aux mœurs et usages.
Section	IV – <i>Matières brutes.</i>
	Matières premières, entièrement brutes ou seulement en partie travaillées, ou produites par des fabrications simples, objets de commerce.
	A) Qui servent aux ouvriers de divers métiers, aux fabriques et aux manufactures:
	a) Produits du règne animal.
	b) Produits du règne végétal.
	c) Produits du règne minéral.
	B) Qui servent:
	a) D'Aliment.
	b) De Médicament.
Section	V – <i>Matières travaillées, consistant pour la plupart en substances simples.</i>

<sup>155</sup> 出處：Dias,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 137. 中譯出自筆者。



- A) Peaux préparées, ouvrages en cheveux, en plumes; pinceaux à écrire et à peindre.
- B) Soie filée et tordue; étoffes de soie et de coton et d'autres matières; broderie et ouvrages de couture; passementerie.
- C) Cordage, cordons.
- D) Tresses, tissus en paille, ouvrages en écorce, en bambou et en autres roseaux.
- E) Papier blanc ou teint, coloré, imprimé, huilé, tanné.
- F) Divers ouvrages en papier et en papier mâché, cartes à jouer, fleurs artificielles.
- G) Ouvrages en bois, de menuiserie; travaillés au tour, etc.
- H) Ouvrages sculptés, en ivoire, en os, en corne, en écailles, etc.
- I) Ouvrages dorés.
- J) Ouvrages vernis et en mosaïque coquilles.
- K) Poterie ordinaire, briques et autres ouvrages en terre cuite; porcelaine et verrerie.
- L) Ustensiles travaillés en pierre, pierres taillées.
- M) Ouvrages en métal:
  - a) en or, en argent.
  - b) en cuivre, laiton, fer et acier.
- N) Vases et autres ustensiles, fondus en bronze, en laiton, en étain et en fer.

Section

VI – *Matières travaillées, composées en plusieurs substances, rangées d'après leur usage.*

- A) Vêtements, coiffures, sandales et autres parures à l'usage des hommes et des dames.
- B) Objets relatifs au culte aux mœurs et usages.
- C) Armes.
- D) Instruments de musique.

- E) Instruments de mathématique, de chirurgie; poids et mesures.
- F) Jeux et joujoux.
- Troisième division. Collection de modèles.
- Section VII – *Machines et instruments pour la commodité et la sûreté de l'homme.*
  - A) Relatifs à l'architecture civile: maisons, édifices.
  - B) Relatifs à l'architecture hydraulique: pont, moulins, digues et écluses.
  - C) Relatifs à l'architecture navale.
  - D) Brancards et autres moyens de transport.
  - E) Instruments pour les incendies.
- Section VIII – *Ustensiles.*
  - A) Meubles et ustensiles de ménage.
  - B) Ustensiles d'économie rurale et de pêche.
- Section IX – *Machines et instruments techniques.*

Von Siebold 的分類 (1837)

Première division.	科學物件系列
Section	I 印刷書籍、手稿和木版
	II 圖與畫
	III 錢幣、獎章和考古出土物件
Deuxième division.	國家工藝物品及與風俗習慣有關的器具
Section	IV 完全未加工或僅部份加工材料、製作簡單成品、交易物件
	A) 不同行業工作者、製造、手工業所用的
	a) 來自動物界產品
	b) 來自植物界產品
	c) 來自礦物界產品
	B) 用於
	a) 飲食
	b) 醫藥
Section	V 簡單材質加工過材料
	A) 加工過皮革、毛髮或羽毛類成品、書寫或繪畫所用毛筆
	B) 絲製品、絲棉或其他材質製成的布、刺繡和裁縫成品、緞帶花邊
	C) 繩類
	D) 編織類、稻草或麥稈編成類、樹皮或堅硬果皮、竹、蘆葦類製品
	E) 白、染、彩、印花、上油、皮革鞣製成的各種紙類
	F) 一般紙或混凝紙漿製品、紙牌、人造花
	G) 木頭、木工、車磨過木製品
	H) 象牙、骨、角、玳瑁等材質雕刻製品
	I) 鍍金製品
	J) 上漆釉或貝殼類拼貼製品
	K) 陶、磚、培燒黏土製品、瓷器、玻璃

	L)	石頭製品
	M)	金屬製品
	a)	金、銀類
	b)	銅、黃銅、鐵、鋼類
	N)	青銅、黃銅、錫、鐵鎔鑄製成之容器與其他用具
Section	VI	複合材質加工過材料，以用途分
	A)	男女使用之衣、冠、鞋和配件
	B)	與崇拜和習俗有關之物件
	C)	武器
	D)	樂器
	E)	數學、外科用儀器、度量衡
	F)	遊戲與玩具
Troisième division.		模型系列
Section	VII	爲了人類之便利與安全而產生的機器工具
	A)	與城市平民建設有關：房屋
	B)	與水利工程有關：橋樑、水風車、水壩、水閘
	C)	與航海工程有關
	D)	車轆和其他交通工具
	E)	消防類工具
Section	VIII	日常用具
	A)	傢俱與家中用具
	B)	農林漁牧業用具
Section	IX	機械與儀器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Hamy, Ernest-Théodore. 1890. *Les origines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histoire et documents*. Paris: J.-M. Place, 1989.
- Jomard, Edme-François. *Considérations sur l'objet et les avantages d'une collection spéciale consacrée aux cartes géographiques et aux diverses branches de la géographie*. Paris: Imprimerie de E. Duverger, 1831.
- Landrin, Armand. "Les musées d'ethnographie, l'ethnographie française," *Revue des traditions populaires* 3.5(1888): 241-246.
- Van Gennep, Arnold.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s enquêtes ethnographiques," *Revue des idées* (Apr. 1907): 314-322.

### 二、檔案文獻

- Procès-verbaux du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民族學中心行政委員會會議紀錄，1925-1954。
-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42-1943," 法國國家檔案館資料，編號 F17 13358。
- "Notes sur l'organisation de l'ethnologie en France, 1942," 法國國家檔案館資料，編號 F17 13358。
- Fonds Rivet correspondance. 人類博物館 Paul Rivet 的書信檔案。

### 三、近人論著

李尚仁

- 2003 〈收藏的帝國：博物館作為科學研究機構的歷史〉，《博物館學季刊》17.2：37-43。

林開世

- 1992 〈文化人類學之父：鮑亞士〉，收入黃應貴編，《見證與詮釋：當代人類學家》，臺北：正中書局。

戴麗娟

- 2004 〈從體質人類學到文化人類學：以法國人類學學會為考察對象〉，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 92-2411-H-001-070。



Belmont, Nicole

- 1974 *Arnold Van Gennep: créateur de l'ethnographie française*. Paris: Payot.

Blanckaert, Claude, Albert Ducros, and Jean-Jacques Hublin eds.

- 1989 *Histoire de l'anthropologie: hommes, idées, moments* [special issue], *Bulletins et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ns 1.3-4.

Blanckaert, Claude

- 1995 "Fondements disciplinaires de l'anthropologie française au XIX<sup>e</sup> siècle: perspectives historiographiques," *Politix: travaux de science politique* 29: 31-54.

Blumenson, Martin

- 1979 *Le réseau du Musée de l'Homme*.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Brosse, Jacques

- 1983 *Les tours du Monde des explorateurs: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Paris: Bordas.

Bynum, W. F.

- 1994 *Science and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zeneuve, Jean

- 1963 *Lévy-Bruhl*. Paris: PUF.

Chapman, William Ryan

- 1985 "Arranging Ethnology: A. H. L. F. Pitt Rivers and the Typological Tradition," in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pp. 15-48.

Chiva, Isac

- 1987 "Le musée-laboratoire, service public de recherche," *Ethnologie française* 17.1: 61-63.

Clifford, James

-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Donald, and Harry Tschopik, Jr.

- 1954 "The Role of Museum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6.5: 768-779.

Collier, Donald, and William N. Fenton

- 1965 "Problems of Ethnological 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n Museums," *Man* 65: 111-112.

Condominas, Georges

- 1972 "Ethnics and Comfort: An Ethnographer's View of His Profess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72, p. 2.

Darnell, Regna

- 1969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1879-1920: From the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to Franz Boa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arnell, Regna ed.

- 1974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Dias, Nélia

- 1991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1878-1908): anthropologie et  
muséologie en France*. 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Dockstader, Frederick J.

- 1967 "Anthropology and the Museum," in *The Philadelphia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Papers Presented on its Golden Anniversary*, edited by Jacob  
W. Gruber. New York and London: Temp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pp. 132-142.

Dumoulin, Olivier

- 1986 "Périodisation," in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dited by  
André Burguière. Paris: PUF.

Fabre, Daniel

- 1997 "L'ethnologie française à la croisée des engagements (1940-1945)," in  
*Résistance et résistants*, edited by Jean-Yves Boursier. Paris:  
L'Harmattan, pp. 319-400.

Faure, Christian

- 1989 *Le projet culturel de Vichy*.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yon;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Fournier, Marcel

- 1994 *Marcel Mauss*. Paris: Fayard.

Frese, Hermann

- 1960 *Anthropology and the public: the role of museums*. Leiden: E. J. Brill.

Ganay, Solange de, Annie Lebeuf, Jean-Paul Lebeuf, and Dominique Zahan eds.

- 1987 *Ethnologique: hommage à Marcel Griaule*. Paris: Hermann.

Gérald, Gaillard

- 1989 "Chronique de la recherche ethnologique dans son rapport a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ahiers pour l'histoire du CNRS, 1939-1989* 3: 85-126.

Gorgus, Nina

- 2003 *Le magicien des vitrines*. Paris: É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Griaule, Marcel

- 1943 *Les Saô legendaries*. Paris: Gallimard.  
1945 *Les grands explorateurs*. Paris: PUF.

Jacknis, Ira

- 1985 "Franz Boas and Exhibits," in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pp. 75-111.  
1996 "The Ethnographic Object and the Object of Ethnology in the Early Career of Franz Boas," in *Volksgeist as Method and Ethic: Essays on Boasian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edited by George W. Stocking.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 185-214.

Jamin, Jean

- 1982 "Objets trouvés des paradis perdus: A propos de la Mission Dakar-Djibouti," in *Collections passion*, edited by Jacques Hainard and Roland Kaehr. Neuchâtel: Musée d'Ethnographie, pp. 69-100.  
1986a "Les objets ethnographiques sont-ils des choses perdues?" in *Temps perdu, temps retrouvé*, edited by Jacques Hainard and Roland Kaehr. Neuchâtel: Musée d'Ethnographie, pp. 51-74.  
1986b "L'ethnographie mode d'emploi: de quelques rapports de l'ethnologue avec le malaise dans la civilisation," in *Le Mal et la Douleur*, edited by Jacques Hainard and Roland Kaehr. Neuchâtel: Musée d'Ethnographie, pp. 45-79.  
1988 "Préface: tout était fétiche, tout devint totem," in *Bulleti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Paris: Éditions Jean-Michel Place, pp. ix-xxii.  
1989a "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Paul Rivet (1876-1958)," *Bulletins et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3-4: 277-294.

- 1989b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en 1930," in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pp. 110-121.
- 1996 "Présentation de l'Afrique fantôme," in *Miroir de l'Afrique*, by Michel Leiris. Paris: Gallimard, pp. 65-85.
- Karady, Victor
- 1982 "Le problème de la légitimité dans l'organisation historique de l'ethnologie français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3.1: 17-35.
- Karsenti, Bruno
- 1997 *L'Homme total. Sociologie, anthropologie et philosophie chez Marcel Mauss*. Paris: PUF.
- Keck, Frédéric
- 2000 "Les carnets de Lévy-Bruhl: entre philosophie et anthropologie, l'expérience de l'altérité," *Gradhiva* 27: 27-38.
- Koselleck, Reinhart
- 1990 *Le futur passé*.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Laming-Emperaire, Annette
- 1964 *Origines de l'archéologie préhistorique en France*. Paris: Picard.
- Latour, Bruno
- 1987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aurière, Christine
- 1999 "Paul Rivet: vie et œuvre," *Gradhiva* 26: 109-128.
- 2003 "Georges Henri Rivière au Trocadéro: du magasin de bric-à-brac à la sécheresse de l'étiquette," *Gradhiva* 33: 57-66.
- Le Goff, Jacques
- 1974 "Les mentalités, une histoire ambiguë," in *Faire de l'Histoire*, tome III: *Nouveaux objets*, edited by Jacques Le Goff et Pierre Nora. Paris: Gallimard, pp. 76-94.
- Lepetit, Bernard
- 1997 "Missions scientifiques et expéditions militaires: remarques sur leurs modalités d'articulation," in *L'invention scientifique de la Méditerranée: Égypte, Morée, Algérie*, edited by Marie-Noëlle Bourguet, Bernard Lepetit, Daniel Nordman and Maroula Sinarellis.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p. 97-116.

Leroi-Gourhan, André

- 1943-1945 *Évolution et techniques*. Vol. 1, *L'Homme et la matière*. Vol. 2, *Milieu et techniques*. Paris: Albin Michel.
- 1947 *Les explorateurs célèbres*. Genève: Mazenod.
- 1953 "Qu'est-ce que c'est ... l'ethnologie?" *Bulletin du Centre de formation aux recherches ethnologiques* 5: 1-5.
- 1982 *Les racines du monde*. Paris: Belfond.

L'Estoile, Benoît de

- 2003 "From the Colonial Exhibition to the Museum of Man: An Alternative Genealogy of French anthropology," *Social Anthropology* 11.3: 341-361.

Lévi-Strauss, Claude

- 1950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in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by Marcel Mauss. Paris: PUF, pp. IX-LII.

Lewitzky, Anatole

- 1935 "Quelques considérations sur l'exposition des objets ethnographiques," *Mouseion* 29.1: 253-258.

Mauss, Marcel

- 1913 "L'ethnographie en France et à l'étranger," *Revue de Paris* 20.
- 1947 *Manuel d'ethnographie*. Paris: Payot.
- 1968-1969 *Œuvres*. Vol. 1, *Les fonctions sociales du sacré*. Vol. 2,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 et diversité des civilisations*. Vol. 3, *Cohésion sociale et divisions de la sociologie*, edited by Victor Karady. Paris: Éditions de Minuit.
- 1979 "L'œuvre de Mauss par lui-mêm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 209-220.
- 1997 *Écrits politiques*, edited by Marcel Fournier. Paris: Fayard.

Menget, Patrick, and Britta Rupp-Eisenreich eds.

- 1983 *L'anthropologie: points d'histoire* [special issue], *L'ethnographie* 79: 90-91.

Merllié, Dominique

- 1989 "Présentation: le cas Lévy-Bruhl,"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14.4: 419-448.



Métraux, Alfred

- 1928 *La 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des tribus tupi-guarani*.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Mucchielli, Laurent

- 1998 *La découverte du social, 1870-1914*. Paris: Éditions la Découverte.

Oddon, Yvonne

- 1989 "Instruments documentaires," in Rivière,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pp. 195-203.

Ory, Pascal

- 1994 *La belle illusion: culture et politique sous le signe du Front populaire, 1935-1938*. Paris: Plon.

Paudrat, Jean-Louis

- 1987 "Afrique," in *Le primitivisme dans l'art du XX<sup>e</sup> siècle*, edited by William Rubin. Paris: Flammarion, pp. 125-175.

Paulme, Denise

- 1979 "Quelques souvenirs,"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19: 9-17.

Picard, Jean-François

- 1990 *La république des savants: la recherche française et le CNRS*. Paris: Flammarion.

Pickstone, John V.

- 1994 "Museological Science? The Place of the Analytical/Comparative in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History of Science* 32: 111-138.

Polin, Raymond

- 1937 "L'ethnologie," in *Les sciences sociales en France: enseignement et recherche*, by Raymond Aron et al. Paris: Centre d'études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Rivet, Paul

- 1929 "L'étude des civilisations matérielles: ethnographie, archéologie, préhistoire," *Documents* 3: 130-134.
- 1931 "Organisation des études ethnologiques," in *Congrès des recherches scientifiques coloniales*, edited by Association Colonies-Sciences. Paris: Association Colonies-Sciences.

- 1940 "L'ethnologie en France," *Bulletin du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2nd ser., 12.1: 38-52.
- 1957 "Souvenirs," *Revue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147.4: 418-420.
- Rivet, Paul, Paul Lester, and Georges Henri Rivière
- 1935 "Le Laboratoire d'Anthropologie du Muséum," *Archives du 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 6.12: 507-531.
- Rivet, Paul, and Georges Henri Rivière
- 1931 "La réorganisatio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Bulletin d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1: 3-11.
- 1933 "La Mission ethnographique et linguistique Dakar-Djibouti," *Minotaure* 2: 1-4.
- Rivière, Georges Henri
- 1929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Documents* 1: 54-58.
- 1932 "L'art du Benin au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Afrique française*, July.
- 1989 *La muséologie selon Georges Henri Rivière: cours de muséologie/texts et témoignages*. Paris: Dunod.
- Rouch, Jean
- 1979 "Le renard fou et le maître pâle," in *Système de signes: textes réunis en hommage à Germaine Dieterlen*. Paris: Hermann, pp. 3-24.
- Rupp-Eisenreich, Britta ed.
- 1984 *Histoires de l'anthropologie, XVI<sup>e</sup>-XIX<sup>e</sup> siècles*. Paris: Klincksieck.
- Schaffer, Simon
- 1999 "Un monde apprivoisé," *Les Cahiers de science & vie* 51: 6-15.
- Schanlger, Nathan
- 1991 "Le fait technique total. La raison pratique et les raisons pratiques dans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Terrain* 16: 114-130.
- Schnapp, Alain
- 1986 "Archéologie," in *Dictionnair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edited by André Burguière. Paris: PUF, pp. 60-67.
- Soustelle, Jacques
- 1937a "Pour une culture populaire," *Bulletin de l'Association populaire des amis des musées* 1: 1-2.

- 1937b *La culture matérielle des Indiens lacandons*. Paris: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 1967 *Les Quatre Soleils, souvenirs et réflexions d'un ethnologue en Mexique*. Paris: Plon.
- Stocking, George W.
- 1983 "The Ethnographer's Magic: Fieldwork in British Anthropology from Tylor to Malinowski," in *Observers observed, Essay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edited by George W. Stocking.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 70-120.
- 1985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Stocking, *Objects and Others*, pp. 3-14.
- Stocking, George W. ed.
- 1985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Sturtevant, William C.
- 1969 "Does Anthropology Need Museums?" *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82: 619-650.
- Taffin, Dominique
- 1999 "Du Musée de la France d'outre-mer au 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d'Afrique et d'Océanie, 1960-1980," in *Le musée et les cultures du monde, Les cahiers de l'École nationale du patrimoine* 5. Paris: École nationale du patrimoine, pp. 113-127.
- Tai, Li-Chuan (戴麗娟)
- 2001 "L'ethnologie française entre colonialisme et décolonisation." PhD diss.,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Tarot, Camille
- 1999 *De Durkheim à Mauss, l'invention du symbolique*. Paris: La Découverte.
- 2003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de Marcel Mauss*. Paris: La Découverte.
- Valéry, Raphaël, and Olivier Dumoulin eds.
- 1991 *Périodes, la construction du temps historique*.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Histoire au présent.
- Vallois, Henri
- 1938 "René Verneau," *L'Anthropologie* 48: 381-389.

戴麗娟

Verneau, René

1918-1919 "Le Musée d'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 *L'Anthropologie* 29:  
547-560.

Williams, Elizabeth A.

1985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sis*  
76.283: 331-348.

# The Museum Age of French Anthropolog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logical Obje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sitivist Anthropology

Li-Chuan Ta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tudies on histories of anthropology usually focus more on the theories of important schools of thought or on the works of famous anthropologists, and less on the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of practice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These, however, are fundamental aspec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discipline. Thus,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rench anthrop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museum played in this process.

Before anthropology was accepted by the university system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the museum provided an independent and complete working place where young students attracted to this new field of knowledge could obtain a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that time, the Musée de l'Homme in Paris was not only the place where research materials were gathered and organized,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produced and circulated, and new talents trained, but also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introducing this new discipline to the public. For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rofessional anthropologists who cam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or professions, that museum was the place with which they identified their working lives as well as their lieu de mémoire when they looked back at their career.

This situation did not change when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set up the first anthropological centre in the middle of the 1920s. However, after World War II, museum anthropology emphasizing practical training declined, and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emphasizing theory became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This shift of emphasis in the discipline was due to three reasons. First, the founding fathers gradually passed away. Secon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rofessional anthropologists trained in the 1930s became dispersed. Third,

debates related to decolonization led to a general suspicion toward museum anthropology. The legacy of the museum age thus missed an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o be examined objectively and was gradually forgotten. Research on th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s of the museum for this discipline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historians of anthropology now need to discuss.

**Keywords: history of French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museum, anthropological objects**